佳木斯文史资料

第四辑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佳木斯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5年8月

前　言

一九八五年是我国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我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全民族英勇抗击侵略者，经过浴血奋战而赢得的。这是中国近百年来，在反对外国侵略的历次战争中，第一次以我国方面取得完全胜利而宣告结束的战争。它不仅振奋了我国民族精神，激发了民族觉醒，而且也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弱国战胜强国的光辉范例。

佳木斯市地区是我国东北边陲的门户，北隔黑龙江与苏联相望；东南经佳图铁路同朝鲜呼应。自一九三二年初夏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便在这一带屯驻重兵，对中国人民实行白色恐怖政策，一心要把佳木斯市地区建设成为进可以觊觎苏联；退可以狼奔朝鲜的重要军事基地。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就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各军（除一、二军外）和各族各界的爱国人士，通过各种方式给日本侵略者以反复的、沉重的打击，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终于迎来了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民族解放的曙光。

为了缅怀先辈们的丰功伟绩，为了教育后代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引导他们为完成祖国统一神圣大业和早日实现“四化”贡献力量，我会谨以诚敬的心情把这本《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四十周年专辑》捧献给广大读者。

但因我们水平较低，不足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在此，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五年八月

目　　录

“八·一五”之后佳木斯地区的政局

彭施鲁

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八月十七日苏军溯松花江进入佳木斯。伪三江省省长卢之淦、伪第七军管区司令官吕衡、伪军少将旅长王嘉善等一批将校军官和一批日本下级军官和行政官员被俘，并被集中看管于佳木斯以东十里处蒙古力军营之内。

苏军建立了佳木斯卫戍司令部，由一位上校师长任司令员。东北抗日联军的成员最先随苏军先头部队进入佳木斯的是佩带苏军上士军衔的王乃武同志。他在卫戍司令部任翻译，兼作苏军先头部队的向导。

东北抗日联军八十八旅在中苏边境的北野营，经过三年的整训，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轻武器的射击技术和爆破器材的使用，还学会了空降、游泳、无线电通信等各种敌后活动所需要的技术和小分队战术。他们在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从广播中得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声明废止苏日中立条约之后，心中已经明白了，这是即将对日宣战的极为重要的信号，光复东北的历史使命将会在东北抗日联军和强大的苏联红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下去完成。同年五月初，德国法西斯宣布投降之后，一批批的苏军野战部队立即调头开向远东。这更明白无误地预示着苏军正在积极地部署着解放中国的东北和朝鲜的战役行动。

由抗日联军八十八旅所派出的十五个敌后小部队，几年

内一直在东北境内积极地活动，执行着战略侦察任务。他们的活动条件是极其艰苦的，其中有不少同志光荣地牺牲在这条战线上，但成绩也是显著的。日伪军的边境要塞的位置、兵力，日伪军沿铁路和公路线的调动，都一直在他们的监视之下；并且不间断地将敌人情况通过电台报告给抗联八十八旅的领导周保中和李兆麟同志。这些情报也经过苏军司令部的分析整理，为苏军进军东北的战役部署提供了最可靠的根据。

一、抗联八十八旅直接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战斗

在一九四五年七月间，一批批苏联炮兵、坦克兵和工兵军官来到抗联八十八旅，把他们手中的东北地区军用地图摆在桌上，向抗联战士们作调查，核实了所有道路和桥梁的通行能力，各条河流的宽度、深度、流速和渡口情况等。

七月底，有二十余名抗联战士分别被派到苏军的野战部队里。这些野战部队都已驻扎在国境线一侧的二十公里之内。这些战士简直成了苏军的顾问，什么东北境内的城镇村庄名称，道路通行程度，少数民族分布情况，风俗人情等，都向苏联军官做出满意的解答。苏联人也象对待客人一样地关心着他们的食宿。

八月初旅长周保中和副旅长李兆麟，分别地向少数抗联干部亲自交待了任务，要他们随时准备以空降方式进入东北腹地，在日军的后方开展游击战，发动群众，袭扰铁路和公路运输，切断通信线路等。八月初有十几名抗联战士被调走。他们是在八月六日、七日的夜晚被空投至东北境内的，任务是对指定的几个主要的铁路和公路线进行严密监视，随

时通过无线电台报告日军的移动情况。

还在八月初，苏军的远东军区军委委员列昂诺夫中将来到了抗日联军八十八旅，和旅长周保中副旅长李兆麟作了长时间的密谈。中午，他在军官食堂利用吃饭时机和军官们见了面，问了大家对伙食有何意见、身体健康情况和军事训练成绩等。在他走后，传出了一些小道消息，说马上要对日宣战了，说抗联八十八旅要在松花江南北两岸投入战斗、配合苏军歼灭日寇；还有的说八十八旅很快要扩编为一个野战军，三个步兵营要扩编为三个步兵师等，这些话听起来是可信的，但一直没有为周保中和李兆麟所证实。

八月八日一整天，小道消息在八十八旅满天飞。有的苏联军官说已经打起来了；有的说这是胡扯；又有人赌咒发誓地说他听到的才是最可靠的消息。人们纷纷地和别人互相核实着所得到的最新消息。尽管有些消息不完全可信，但都足以鼓舞人心。直到那天半夜，还有三五成群的人们在帐蓬外热烈交谈着。

八月九日早晨六点钟的广播，头条新闻就是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并宣布苏军已突破日军防线，进入东北境内。教导旅顿时沸腾起来了，人们欢呼着，互相拥抱着，互相传播着所听到的广播内容，又互相议论着抗联人员会在何时何地参加战斗等。

上午八点钟召开了全旅的军人大会，周保中和李兆麟同志向全旅人员宣布了苏联对日的战争已正式开始，中国的东北部和朝鲜半岛被解放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抗联的所有人员都要整装待发准备随时投入战斗，狠狠地打击日本侵略者。

军人大会结束后，周保中召集了营以上干部开会，宣布

了全旅将在一二日之内出发，将有一只苏联运输舰负责沿阿穆尔江①送我们在富锦县方向投入战斗。

八月十二日，一只苏联运输舰沿阿穆尔江来到北野营附近，停靠在岸边。大家加紧地整理行装，擦拭武器，准备马上踏入祖国大地，去完成解放东北的神圣事业。

二、行动计划改变了，要迅速进驻五十七个要点

行动被推迟了。原因是苏军的第一线部队出乎预料地进展神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日本军的有组织的抵抗，而且可以预见全东北的解放可能只会是几个月的事情。

情况变化得太快了，开战三、四天之后，苏军已经从四面八方指向哈尔滨、长春和沈阳等中心城市，这时日本人发出准备投降的信息。苏军准备了大量的空降部队，准备用他们去占领上述几个城市。

这些都是极为振奋人心的消息。但是抗联八十八旅的行动却因此而被推迟了。原因很简单，原来的行动方案已不适应这种形势了。应该考虑的是在全东北解放之后，所有的抗联干部和战士该如何行动了。原来想扩建为一个野战军，只在某一个区域行动的方案，显然是有局限性了。

中国共产党东北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包括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以及朝鲜同志金××、崔石泉等，整天在开会分析形势，研究行动方案，不时地还和一些苏联军官们共同商讨这些问题。终于确定了以下一系列问题：1、抗联八十八旅集中行动的方案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2、所有抗联的同志将要被分派至东北各大中等城市及一些重要的县城，为此指定了五十七个要点要进驻；3、绝大多数朝鲜族

干部和战士要回到朝鲜去独立地进行工作；4、各工作组进入东北城市之后的任务是：寻找我们党的秘密组织尽快和延安党中央取得联系；找回来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和失散的东北抗日联军战士；贮存武器弹药，重建武装队伍，准备和国民党相对抗；建立群众性的左派政治团体，开展群众性的工作。

根据这样的决定，确定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三人分别带领一个大工作组到长春、哈尔滨和沈阳；王效明、王明贵、陈雷、彭施鲁、张瑞麟、金光侠、姜信太、陶玉峰、乔书贵、刘健平、张光迪等分别带领十几人的工作组进入吉林、齐齐哈尔、绥化、佳木斯、北安、牡丹江、延吉等城市；此外，还有重要的县城四十多个点，各去四、五人。各组的主要负责人都以该城市的苏军卫戍司令部的副司令员身份出面，为的是便于开展群众工作，也便于和苏军协同进行工作。

根据上述决定，我于九月三日就率领在合江地区工作的四十余人乘飞机来到了佳木斯，并且很快按预定计划把力量分布在各个主要县城。刘雁来在富锦，杨庆海在依兰，曹曙焰在勃利，宋殿选在汤原，张凤岐在兴山镇②，武昌文在方正，芦连峰在通河，杨凤鸣在宝清（李铭顺从苏联回到宝清后，实际上由他负责了）。他们也都是该城的苏军卫戍司令部的副司令员。在佳木斯和我共同工作的有高英杰、王乃武、秦昌胜等十二人，高英杰是我的主要助手。

三、佳木斯的政治情况

我到达佳木斯之后，先听了王乃武同志的汇报，得知当时地方政权是由苏军指定的维持会负责，维持会长是当地的

一个较大的资本家曲子明。国民党的组织已公开出现了。因为国共两党在东北的地下工作，都处于敌伪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之下，又因两党互有看法、工作重点和方法上的不同，所以两党互不了解对方的活动情况，更没有任何方式的接触。国民党党部的牌子公开挂出来了，书记长是一个伪省政府的高级职员，叫张人天。此外，还出现了一个政治团体，宣传单上用的名称是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从传单的内容上判断，可初步看出这是一个左派团体，可能有地下共产党员在其中进行工作。经过几天的了解，没有发现正式的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在活动。

我和国民党党部未正式接触过。虽说抗日战争期间国共是合作的，但是在东北地区没有过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历史。是国民党把东北人民出卖了，我们抗日联军的战士没有任何人和国民党人之间会产生战斗友谊。对于这个问题，我同苏军的佳木斯卫戍司令部的政治副司令格里洛夫交谈过，认为不应承认国民党党部在佳木斯有合法的活动权利。他的回答是，这属于中国人民的内部政治事务，苏军不便于干涉。他的回答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在东北各地的苏军也都持同一态度，但是抗联战士在感情上是不能完全接受的。过往于佳木斯的抗联战士曾气愤地对我说过，他们在别的城市曾撕下过国民党的旗帜。

我急于要寻找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组织者，在九月六日，由王乃武同志找到了赵子学和井田两个发起人。在交谈当中，赵子学自称是一九三八年前在依兰县工作过的共产党员，以后失掉了组织关系；井田自称是共产党员，是一九四二年日本侵略者在山东省大扫荡时从那里逃跑出来到东北

当劳工的，也失掉了组织关系。他们自称是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自发地组织成了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开始只有十几个人，其中有参加过抗联的，也有在关内参加过八路军，被日本人俘虏后强迫到东北当劳工的。他们都是急于寻找共产党组织的人。当他们看到国民党党部在佳木斯出现时，心中很着急，便商量着成立一个政治团体，并且写了自己的宣传单，用以表示揭露国民党出卖东北和感谢苏军解放东北的政治立场。

我当时对赵子学和井田的历史无法进行查证，但从他们对待国民党的态度来看，可暂定为左派团体，需要依靠他们来开展群众性的工作。

由于我的公开身份是苏军的卫戍副司令员，而且经常和另一位副司令员格里洛夫共同行动，一时名声很大，人们理所当然地断定我是共产党人。因之，在兴山镇工作的刘银喜（从河北来的秘密党员），在勃利县工作的李述（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在宝清县工作的程绍良（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我在一九三七年在宝清打游击时认识他们），在汤原县工作的邢健，在长发屯的史纯儒（原抗联第六军团长），都陆续来找我，要我承认他们是共产党员，并要求给予工作任务，他们都向我讲述了自己的历史。

看来是需要很快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政治团体把上述的这些同志吸收进来，首先用以和国民党进行斗争，同时由他们去领导各地自发的武装队伍。当时自发性的武装队伍较多，都是在日本军溃败时群众利用所得到的枪支自动组织起来的。

我于九月十日找来赵子学和井田，和他们商讨中华民族

解放委员会如何确定自己的政治任务。我说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之后，民族解放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现时应是研究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一个是以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为纲领的国家制度；一个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式的国家。我们应该明确提出争取人民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因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为争取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为主要目标的政治团体，其名称也可以称之为佳木斯人民民主同盟。我的这个建议为赵子学和井田所接受了，他们决定将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改为人民民主同盟佳木斯委员会，赵子学和井田为副委员长。开始，赵子学宣布一个在伪军当过团长的罗庆本为委员长，我认为不妥。罗庆本以后实际上未参与任何工作。在九月中旬公开宣布成立时，参加成立大会的有二百余人，由我就民主同盟的政治任务作了讲话。

当人们知道了人民民主同盟是在我这样的有苏军卫戍副司令员身份的人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时候，愿意参加这个组织的人突然多起来了。其中确有不少是在关里八路军或东北抗日联军干过一段时间的人，但也有一些是抱有各种不纯动机的人。不过，这些还一时弄不清楚，只好先干起来再说。当时主要的活动任务是：1、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东北抗日联军在解放东北三省中的作用，揭露国民党出卖东北的罪恶行径；2、揭露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反动性和腐败性，宣传在中国必须结束国民党的专政独裁体制，建立有各党派参加的民主的联合政府；3、把各地的自发性的武装队伍组织起来，选择原来在抗日联军工作过的人去掌握这些武装；4、在合江地区各县建立人民民主同盟的分支组织。

在这个同时，国民党的活动也相当积极，在佳木斯办了三民主义青年团训练班，吸收了男女青年四五十名参加；组织了宣抚委员会，用以收容日伪军、警和宪兵特务残余分子和收编地方自发的武装队伍。我原来对它的能量估计不足，总认为东北人民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不会拥护的。但是以后证明他们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效不算太小。

佳木斯维持会实际上起着市政府的作用，当时他们只能根据苏军的指示行事。维持会的主要任务是保证苏军占领期间的后勤供应。会长曲子明是个资本家，又在日伪时期当过勤劳奉仕大队长、协和会长等汉奸职务。维持会虽说自己美其名地挂着中国复兴委员会的牌子，而实际上却在暗中保护着日伪时期的警察、特务和检察官等。苏军在搜查这些人时，曾在曲子明的商店福顺泰的后院里查出三十余支长短枪支和几百发子弹。曲子明实际上是继续与人民为敌，群众对他是极为仇恨的。

各县的民主同盟分支组织很快地相继建立，有的是由佳木斯民主同盟派去的人为骨干，有的是由各县来找我联系的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为骨干，都得到了在该县工作的抗联同志的支持。分散在各县的自发性武装队伍，多数与民主同盟建立了联系。

根据佳木斯民主同盟某些成员的报告，得知在蒙古力俘虏营中伪军少将旅长王嘉善曾几次窜来市内，并到过国民党党部开会。同时得知由沈阳派来了一个国民党的代表（姓罗）在佳木斯以宣抚委员会名义秘密进行收编地方武装的工作。我和格里洛夫研究了这一情况，他对此很吃惊。我们商定对这一情况要继续予以严密监视。两三天之后，我得知王

嘉善又去佳木斯国民党党部开会，就和格里洛夫立即驱车前去，突然闯入国民党党部，正好王嘉善和六七个国民党人都在场。我们责问了王嘉善为什么随便从俘虏营出来，他无言以对。我又质问国民党的书记长张人天，为什么要和伪满的将领勾结在一起？他支吾了几句。我们命令王嘉善随我们返回了俘虏营。

在日本统治时期，佳木斯最后一任的伪市长是段宝坤，当时还在佳木斯住在家里。民主同盟有人提出应该将他按汉奸来惩治，我很赞成这一主张。民主同盟派了四五个人携带武器于半夜间越墙进入段的住宅，将他抓走关了起来。此事我并未告知格里洛夫，并且还打算借公审汉奸以进一步发动群众。但是两三天之后格里洛夫问我是谁抓走了段宝坤？我佯装不知。格里洛夫说他认为是民主同盟干的事并说他不赞成这样的事，要求我做工作，将他释放。我说对待汉奸，惩办一下也是应该的。他说，有两条理由可以赦免他。一是他本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搞煤矿的，你们为了恢复生产需要他；二是他当市长的时间只有四个月。根据这样的情况，我和赵子学与井田二人商量了一下，认为当时还是苏军军事管制时期，我们的一切重大行动都应该和苏军之间有个协调。凡是苏军不赞成的事情，我们可以缓办。在我们商量了之后，决定释放段宝坤回家。

四、佳木斯地区的地方武装

佳木斯一带的自发性地方武装相当多，他们的政治态度也是颇难捉摸的。开始都是以自卫名义出现的，在日伪军被击溃之后，中国人民自己的政权尚未建立起来之前，苏联军

队只驻在大中城市，广大农村处于权力真空地带。这时任何一支武装力量都会对今后的政权发生影响；同样的，每个人所握有实力的大小，也会影响着他本人今后的政治地位。真正有明确政治目标的武装队伍，我认为是很少的。当时东北的政局还有许多捉摸不定的因素，国共之争谁胜谁负，的确难以预测。地方武装都在观望着。开始他们看到共产党人占有一定的优势，表示要依附于共产党。但以后又传说国民党要接收全东北，而且其军队沿山海关、沈阳、四平、长春向北节节进逼，又企图依附于国民党。但是究竟鹿为谁有？一时难以判断。当时流传着的话是："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老爷当八路"。这是当时对一般人处于投机心理状态的如实写照。许多武装队伍还处于两面派状态，就是当时所说的"明八路，暗中央"，公开的接受了共产党的收编，但又暗中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国民党在各大城市设立的非公开的宣抚委员会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当时在合江地区的武装队伍的头头，和民主同盟有较密切联系的，有驻长发屯的史纯儒，驻悦来镇的王福和赵凯良，驻大来岗的顾老太太，驻兴山镇的刘银喜，驻鹤立的郝风山，驻宏克力的李忠祥。此外，依兰、富锦、宝清、勃利等县的民主同盟也都建立了自己的武装队伍。史纯儒和赵凯良原为东北抗日联军潜伏下来的人员，刘银喜为关内秘密派至兴山镇的共产党员，顾老太太是抗联时期的抗日积极分子，两个儿子都参加了革命。他们几个人所率领的队伍以后都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但是王福、郝风山和李忠祥等过去是惯匪，这几支队伍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前后陆续投向国民党，李忠祥的队伍还伏击了苏军。以后他们都被三江人民自

治军消灭了。

大来岗的顾老太太，是我在一九四五年的九月中旬认识的。那时苏军司令部得到报告说，在大来岗的西边十几里一个小屯子有日伪军的残余武装袭扰。苏军立即派出一个连由我和格里洛夫率领乘三辆卡车前往。但是经过对该屯的搜索，并未发现目标，可能是已经跑掉了。执行任务完了之后，就回到大来岗休息。我和格里洛夫住在一家较宽敞的院里。这家的主人正是顾老太太。她对我们非常热情，谈起话来得知她有两个儿子都参加了革命。大儿子叫顾传忠，参加过抗日联军，已经死去；二儿子叫顾峰，在关里八路军工作。这就使我们的关系亲近了一步。以后又进一步谈，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期间，抗联第六军的队伍经常活动在汤原、依兰、桦川一带，第六军军长戴洪滨经常过往大来岗，顾老太太是抗联的积极支持者。她家虽然是地主，但是抗日的政治立场是鲜明的。对她有两个儿子参加革命，很感到自豪。她在一九四五年底至一九四六年期间对三江人民自治军的建立和共产党在合江地区政权的建立，都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她的第四个儿子顾传远还率领大来岗的自卫武装三四十人参加了三江人民自治军。

五、党中央派出的军队和干部陆续来合江

一九四五年十月初，我派往长春向周保中同志送工作报告的交通员徐玉林回到佳木斯。周保中同志在给我的信中告知我已和党中央建立了联系，我们今后将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这个消息使我得到了极大的宽慰。因为东北抗日联军从一九三七年底开始就和党中央失掉了联系，我们

长期地处于极端困难而且孤立无援的状况之下，孤儿一样的心情一直沉重地压在心头。这一下子豁然开朗了。

振奋人心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地来到了合江。十月二十五日关内共产党的部队八百余人在孙靖宇的率领下来到了勃利县。勃利县的抗联代表曹曙焰同志立即派人送信给我，我接信后立即动身坐火车去勃利县，并于半夜见到了孙靖宇。我热泪盈眶地拥抱了他。我们终于和八路军会师了，真是天大的喜悦啊！孙靖宇在路经哈尔滨时会见了李兆麟，并由李兆麟写了一封信给我，说孙靖宇奉命率领八路军到三江地区组建人民自治军，要我给予协助。孙靖宇告诉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队伍已经源源不断地由关里开到东北来。他是由山东渤海地区乘船在辽宁的兴城附近登陆，尔后开赴北满来的。

对于孙靖宇所率的部队，为什么使用三江人民自治军而不用八路军的番号，以后我了解到其原因是：当时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曾约定：在苏军占领东北期间（原定三个月），中国的军队不应进入占领区。这样的规定可能是为了避免在占领期间的秩序管理上的多头化。但这一规定并不限制各地区为了自卫所建立起来的数量不大的武装队伍。实际上孙靖宇同志所率领的八百余人的武装队伍，其中只有不足一百人是在山东地区的八路军队伍。他们到达沈阳附近时才扩编成一个连，同时在干部方面得到了一些补充，并在去佳木斯的沿路上大量补充了新兵。因之他们的确不能说是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并且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用了“三江人民自治军”的番号（有的地区用的是“人民自卫军”的番号）。

苏军对于共产党的部队出现在合江之事是高兴的，同时也是出乎预料之外的。因为我知道苏联对中国共产党能否和

国民党相抗衡一向是估计不足的。而且按照中苏两国政府间的协定，苏军在东北的占领期为三个月，而结束占领时将应由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来接管东北。因之苏军未曾预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会抢先到达合江地区。格里洛夫和我交谈这一问题时流露了上述想法。那时实际上他们不想介入国共两党的斗争，但又无法完全保持中立状态。开始他以喜悦的心情支持我把孙靖宇的部队迎接进驻佳木斯市。而且我为了在佳木斯车站广场举行欢迎仪式所组织的一千余人的地方武装部队，也事先在佳木斯市内住了两三天。这些事情格里洛夫都是默许的。但是在孙靖宇到达佳木斯几天之后，他又向我转告说他得到上级指示，要求共产党的部队离开佳木斯，最好驻扎在农村。他说这是为了避免国民党寻找借口，说苏军已在事实上把佳木斯移交到中国共产党手中。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部队都离开了佳木斯。孙靖宇的指挥机关设在佳木斯以南三十里的长发屯。

到了十一月十七日，又一个喜讯传来了。我吃完早饭，突然有一位年轻同志到卫戍司令部的后院见我，说他是和李延禄、李范五一同从延安来的，共有三十余人。并说他们住在一个客店里。李延禄和李范五一会儿就到卫戍司令部见我。我真是喜出望外，便拉着他一块快步出去向他们住的客店方向走去。走到半路，在佳木斯的电话局（现中山路邮电局）附近遇见了李延禄和李范五等四、五个人。我和李延禄分手快十年了，他的面貌未变，我首先和他握手之后又长时间地拥抱了他，尔后又和李范五等同志一一握手。

当我带领他们来到苏军司令部后院我住的小平房之内后，李范五同志交给我一封周保中同志的信，内中说根据东

北局的决定，由李范五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合江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李延禄同志担任合江省主席。并指示我今后在合江省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我读完信之后说：这太好了，我们的党、政府和军队的建设现在可以同时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了。接着我就向他们汇报以下几件事：1、抗联同志在合江省几个县的分布情况和工作情况。2、民主同盟的情况。3、和国民党之间的斗争。4、孙靖宇部队来后的情况。5、苏军对我们的态度等。我建议我们应该立即和苏军的卫戍司令员见见面，争取他们的支持。李范五说，对！是否现在就能见到他们？我说，你们先等一下，我马上就去找他们商量此事。当我到了银行的楼上找到格里洛夫时，他对我带来的新消息也感到高兴，并且愿意和另一位管军事工作的中校副司令一同会见李范五和李延禄同志。我很快地把李范五和李延禄从银行的后院引到楼里来和格里洛夫等交谈了一小时。苏军总的态度是：对新来的客人是欢迎的，但表示了以下的政策：苏军解放了东北之后满三个月就准备撤走，并把政权移交给中国人民。至于是国民党接收东北还是共产党接收东北，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军不去干预。现在他们所接到的指示是不允许任何正式武装部队驻在佳木斯市区之内，这是保证市区的正常秩序所必需的。至于你们的部队在农村的广大领域之内和国民党怎么斗，那苏军就不应该过问了。此外，你们的党、政府机构如何工作，是否设在佳木斯市内，我们不便干预。正如国民党的机构设在市内我们不加干预一样。但同时格里洛夫又郑重地声明说：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是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战胜自己的对手的，我们将会尽可能地给予支持。

这样实际上苏军是以默许的方式支持了我们的党和政府的建设工作。自从李范五来了以后，从关内派到东北来的党政干部，一批接着一批地来到了佳木斯，到了一九四五年底合江地区几乎所有的县委和县政府都搭起了架子。合江省工作委员会的班子也逐步配齐了。到十二月下旬，方强同志又到了佳木斯受命组建合江军区司令部。高大钧同志亦被任命为佳木斯市市委书记，董仙桥同志为市长（他原为佳木斯的老地下党员），孙西林为副市长。

六、国共两党的斗争逐步激化

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合江地区的斗争，是从共产党的武装队伍到达之后逐步激化的。国民党不甘心处于劣势地位，而且可以凭借着国民党在全国范围之内的优势，和我们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大力收编土匪队伍，象原东北抗日联军的叛徒谢文东和李华堂的队伍，虽说每支也不超过一千人，国民党也可以封之为上将集团军总司令。已经被孙靖宇收编为三江人民自治军的孙荣久的队伍，也被国民党拉了过去，封为中将军长。还有一个张雨新只有几百人，也同样被封为中将。到十二月时，由于国民党的军队在美国的大力支援下，攻占了山海关和锦州，并向沈阳、长春挺进，这时合江地区的土匪也开始嚣张起来，他们攻打勃利、林口、鸡西、汤原、同江等城，还杀害共产党的干部，这就开始了三江人民自治军和这些国民党土匪部队长达一年之久的生死搏斗。原来佳木斯民主同盟所收编的队伍，如在悦来镇的王福，在鹤立的郝凤山和宏克力的李忠祥，也暗中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开始打起共产党了。李忠祥的队伍还打死了几十名苏军

士兵。方强同志到达佳木斯之后不到十天时间，就到依兰县，以孙靖宇的三江人民自治军司令部为基础，组建起来了合江军区司令部，并开始了剿匪作战。

在这个同时，国民党还利用佳木斯民主同盟大发展之际打入了这个组织。象刺杀孙西林同志的凶手邬捷飞，参与抢劫民财的民主同盟手枪队长冷松彬，都是国民党有计划地派进来的。民主同盟内部的严重不纯在十二月间已被我们发现了。省委决定由市委书记高大钧同志亲自率领工作组进驻大同盟了解情况，对其中自称为共产党员而又能提供出在历史上自己的真实经历、无大问题且又现实表现较好者，准其重新办理入党手续。对有些虽也自称为共产党员，但历史尚未弄清而现实表现又不好的，暂不承认其党籍。对其中少数人既缺少明确的政治态度，又参与过抢劫民财，侮辱妇女的予以清理。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发生了民主同盟的宣传部长邬捷飞刺杀副市长孙西林案件。同时还发现了铁血青年团这个反动组织的成员也都是民主同盟的人。这个多数以十八、九岁青年为成员的团体，以张中甲为首，以暗杀我党干部为目标。鉴于上述情况，省委确定："鉴于民主同盟内部的严重不纯，决定停止其一切活动。对其中表现较好的重新分配工作"。这样佳木斯人民民主同盟的存在前后只有五个月的时间，而开展工作的时间也只有一九四五年的九、十、十一这三个月。在这个期间他们同国民党进行过斗争，还争取到一部份地方武装站到共产党一边。这些对我党都是有利的。

在发生了孙西林被刺事件之后，我们组织了一次对国民党成员的大搜捕。国民党党部的公开存在也由此结束了。其后的斗争形式主要是和国民党所勾结的土匪队伍之间的殊死

搏斗了。

七、我省政府曾被苏军赶出佳木斯

在一九四六年的二月到该年的四月上旬苏军撤退之前，还出现一次苏军把我合江省政府赶出佳木斯的事件。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国民党的军队攻占了四平和长春，并继续向北前进，似有攻占哈尔滨的意图。我们的党中央也有明确的电报指示：在东北的我军应暂时放弃大城市，转向广大的农村，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为主。我军从四平和长春的撤出也是在接到这一指示之后。苏军在这个急剧变化的局势下，又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实力，认为他们有可能接管全东北。因之他们做了迎接国民党合江省主席的打算。这就必须先把我们的省主席赶出佳木斯。在二月初，苏军卫戍司令部约见了省工委书记李范五和省主席李延禄，提出了上述意见，实际上是下了逐客令。当时李范五同志向他们讲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国民党是没有力量进到佳木斯来的。他的军队来不了，省长也不可能来的，要求苏军对此不要担心。但是苏军解释说他们是在执行上级的指示，无法对此加以讨论。经过反复争论之后，未能使苏军做出让步。在第二天，李延禄率省政府的班子离开佳木斯，改在依兰县办公。省的工作委员会则留下了一个精干的机构，坚持佳木斯的工作。

实际上当时的情况，并不象苏军所想象的那样。国民党的军队进占长春之时，已经被打得筋疲力竭。我军主动撤退到德惠以北的第二松花江北岸设立了防线。国民党的军队沿铁路进至该江南岸的陶赖昭火车站之后，就不敢再前进一步了。以后也一直未能跨过这一条不大的江河。共产党在北满

稳如泰山。在这种情况下李延禄所率领的省政府的班子在离开了二十多天之后，又回到了佳木斯。

八、苏军的撤退

中苏两国最初商定，苏军在东北的占领期为三个月。依此，苏军应于一九四五年的十二月撤出东北。但是这个时间表应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大大地推迟了。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国民党政府的庞大官僚机构，办事效率极低；二是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接收东北各级干部班子难产，贻误了时机。本来国民党有许多有利条件，特别是在运输工具上，陆路、海路、空路都占有优势。但是直到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下旬，也就是日本投降之后拖延了两个月，熊式辉才率领了一个庞大的接收班子四百人到达了长春，而那时中国共产党所组建起来的人民自治军或自卫军已经遍布于东北，大批的党政工作干部，来自延安的，来自山东的，和来自山西与河北的，全靠两条腿昼夜兼程，和国民党赛跑，到十月下旬已多数到达了北满各城市并开展了工作。我前面已经说了，佳木斯地区在十月二十五日已经出现了从山东来的孙靖宇的八路军队伍和一部分党政干部，十一月中旬共产党的省委机构和省政府都宣布成立了。而国民党接收大员熊式辉所率领的四百人的班子，住在长春的高级旅馆里，面对这种形势惶惶不安，不敢把人派出到各省城和专区去执行接收任务，认为生命安全无保障。他们在长春住了好久，什么事都没有干成。

共产党在进入东北这一战略行动上，效率之高确实是出

乎国民党的预料之外的。其原因我们认为：其一，党中央的决心大，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很快做出决定派十万部队，两万名干部进入东北；其二，八路军的冀热辽军区占有先机之利，进入东北的路途最短，在九月中旬就进至沈阳周围；其三，共产党的干部能吃苦，不计较地位高低，点到谁的名谁就走，让到哪就到哪儿，没有任何扯皮现象；其四，东北抗日联军也占有先机之利，到九月初就进驻了东北的五十七个工作点，除了负责恢复党的组织和建立武装队伍之外，还起着抗日联军办事处的作用，各点的负责人又兼有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的名义，为八路军部队和从延安来的党政干部进入该地区创造了特殊有利条件。

鉴于上述情况，国民党认为如果苏军在一九四五年的十二月从东北撤退，那就会使东北全部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因之要求苏军缓期撤退。但是这个缓期实际上对共产党也有利，使我们有时间巩固一下自己的阵地。

到了一九四六年的四月初，苏军佳木斯卫戍司令部向我们的省委和省政府告知，他们将于四月五日撤离佳木斯。并且申明他们将不向我省政府正式办理接交仪式。我们表示，对这样的决定完全理解，可以免得引起国民党政府的异议。他们还申明了：鉴于佳木斯地区土匪队伍的猖獗，他们的撤退将不公开宣布，以免土匪利用这个时机攻打城镇。任何群众性的欢送苏军回国的场面都是不必搞的。撤退的行动将在一夜之内完成。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随后就是我们迅速地组成了若干个接收工作组及其警卫分队，分别地于四月五日夜晚将所有苏军撤走的营区、机关、仓库加以占领。当四月六日清晨佳木斯的人民群众醒来时，已经看不到任何一

个苏联军人的影子了。从此之后，佳木斯地区的政权，被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

编者注：

①、阿穆尔俄语黑水的意思，指黑龙江。

②、现在的黑龙江省鹤岗市。

柳润生烈士传略

王志声

柳润生原名树堂，学名清庭，别名槐三，到延安时化名润生。原籍吉林省扶余县第二区北平乡王家窝堡村。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生于破落的地主家庭。曾在本县私塾及高小读书，肄业于本县初级中学。“九·一八”事变后，组织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转战东北三省及热河、察哈尔省。历任国民党团长、支队长、副旅长、骑兵师师长等职。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北事变后脱党，一九四一年重新入党。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从延安到佳木斯，任合江省保安处（后改公安处）处长及合江军区副参谋长、第四支队支队长等职。剿匪结束后转入地方工作，曾任合江省财政厅厅长、建设厅副厅长，农业厅厅长等职。不幸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在患病期间被国民党特务暗害，享年四十九岁。

组织义勇军积极抗日

柳润生于中学肄业后即在家务农，兼理家务。一九二九年入骑兵十四旅骑兵教导队受训六个月。毕业后，被地方人推选为北平乡乡长，兼任县保安队二队队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三省，东北各地人民，不甘心日寇侵略，纷纷奋起抗日。柳润生热爱祖国，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联络当地驻军骑兵十三团一、二连连长刘忠良、崔云凌等，谋划组织抗日武装，串联本县地方自卫团。经刘、崔同意于一九

三一年十二月率领地方自卫团及驻军两个骑兵连，共五百余人，正式揭旗抗日，定名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设筹备处。他由家中拉出四匹马，并把家中的长短枪三支拿出来以供抗日，大家公推柳为队长，继续发展抗日武装。一九三二年二月与东北抗日将领李杜取得联络，改编为马占山之第三军李忠义部十三团，柳任团长。攻扶余、农安、蛟河。四月渡松花江攻肇州、肇东，柳均身先士卒。五月攻安达，柳负伤，退于海伦。六月遇马占山，编李忠义部为抗日义勇军第三军，柳任第三军第四支队长，辖三个骑兵团（后扩充至五个骑兵团）。攻克绥棱、庆城、兰西、青岗、甘南、昂昂溪、大来、庆安、乾安等十余个敌占城市。当时的义勇军既无政治领导又无政权组织，也无根据地，缺乏与群众联系，形成单纯的军事抗战，以致缺乏武器、弹药、物资装备的补充。敌人又利用地主、汉奸，逐步削弱抗日力量，迫使柳润生等义勇军，不得不转战内蒙。柳部又于通辽火烧庙、新蒙古公司等处予以日寇重创后，撤入热河省境。不久热河督军汤玉麟投降日寇。

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一月，北平（北京）抗日后援会朱子樵先生与军分会张学良合衔调各部义勇军至热东整顿补充，以便参加长城战役。改编李忠义为第八军军长，柳仍为第四支队长。为了便利指挥，加委他为该军团前敌指挥。一九三三年，长城战役失利，驻热东开鲁县之骑九旅崔兴武及二十八团团长李守信等投降日寇，放弃开鲁，义勇军后路被敌人抄袭。奉抗日后援会电令，义勇军全部退至察北及热河赤峰，柳润生被编为挺进军刘翼飞部任一百一十团团长。

一九三三年五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抗日将

领在张家口组成察（原察哈尔省）、绥（原绥远省）民众抗日同盟军。李忠义、柳润生、刘警愚等率部加入同盟军，被编为抗日同盟十六军，李忠义任军长，柳润生部属改为骑兵第一师，柳任师长，刘任骑兵第二师师长。统归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指挥。在吉的指挥下，收复了多伦，驱走了李守信的伪军。虽然获得胜利，但部队伤亡很大。不料这时国民党派汤恩伯到下花园包抄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后路，同盟军腹背受敌，只好退守张垣。

加入共产党献身革命

当时在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中，有很多共产党派遣的干部，以吉鸿昌、柯庆施等同志为首，领导策动抗日工作。柳润生思想进步，积极抗日。一九三三年四月，驻守察省张北县时，经宗侄柳国东（俄专毕业）介绍于晓凤、刘一之等党员来队当文书上士，从此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逐步认识了谁是真抗日、谁是以抗日为名而实质上破坏和削弱了抗日力量。他渐渐地靠近了共产党，成为党培养发展的对象。

在李忠义任十六军军长、柳润生任骑一师师长时，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内部极为复杂。仅骑一师主要的共产党员即有于晓凤、于汉伦（一团中校团付）、白坚（在参谋处）、张君平（在三团政治处）及刘志诚、王一夫、张子和等同志，以张子和为前卫党内领导。还有国民党兰衣社分子杨参谋等。除一些爱国青年外还有其他派、系的人员混入部队。李忠义这时已觉察到柳润生思想激进，靠近共产党，对他深为怀疑。乃派其外甥李一虎为骑一师参谋处长，以便监视柳的行动。李一虎是国民党特务，专为破坏抗日力量：乃唆使李忠义破

坏李与柳的关系。并诬蔑军参谋长古松年为共产党员，李忠义即信以为实，乃枪杀古松年。并拟将骑一师各处进步流亡青年调去军部受训，企图一网打尽。张子和等同志为挽救这一危机，确保抗日力量，也是考验柳润生，便向他讲明此事。柳润生以抗日利益为重，并有意将部队拉往共产党力量较强之察省商都一带，以便长期坚持抗日。李一虎不同意，坚欲投靠国民党，双方矛盾尖锐以致激化，柳乃当机立断，下令将李一虎枪决，解救了一些革命同志。柳与骑二师师长刘警愚共同抗日数年，情谊较深，在柳的动员下，与柳共同通电声明李忠义破坏抗日阵线，并率领骑一师、骑二师脱离李忠义节制。经冯玉祥电令，骑一师、骑二师改归十五军张允荣节制指挥，调驻张北公会镇及馒头营子。

经此次事件考验，党组织认为柳润生深明大义，能以党的利益和抗日利益为重，真心拥护共产党，抗日立场坚定。经张君平、于晓凤二同志介绍，于一九三三年八月柳润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作上层工作，担任前卫军执委，不过组织生活，有事直接与张志诚同志商量。

一九三三年八月底，冯玉祥被蒋介石所迫，离开察、绥抗日同盟军，善后事宜交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处理，宋乃率一三二师全部及三十七师之二一八团宁团抵张北，即派其副官乘车持函邀柳见面。柳润生去张北谒见宋哲元时，十五军军长张允荣及少将高参萧振瀛（柳之妻兄）均在彼，威胁利诱柳部服从国民党改编。柳润生再三申明抗日之初衷不可改变，并策略地提出：“所属部下，当初追随他，目的即在抗日。应与所部商议，不能独断专行”，以作缓兵之计。待返防

后，即向组织汇报、请示，经组织决定，将部队集中察省商都（现内蒙）。柳拟召集各团会议，商讨出发之事。岂料是夜十五军军长张允荣率部队进驻于柳所在地二团团部馒头营子，打电话命令柳润生师及刘警愚师即到馒头营子集合、公会镇防务交宁团接替。副官接悉电话，一方面报告柳润生，另一方面通知各团、处。各团闻悉，鉴于国民党势大，乃秘密开会决定迫使柳润生归二十九军改编。翌日晨，一团长张鸿陲及军需崔云凌，强迫柳润生随其等出发，并收回政治处枪械。当时，柳所在的二团被张允荣监视不能集中，一、三团异口同音愿归二十九军改编。在此情况下，柳被迫无计可施，乃提出要求，必须保护抗日青年，让他们安全 离开公会 教 堂险地（共产党员张君平等人），并各送三十元大洋以为赴商都之路费及生活费。待部队抵馒头营子，张允荣在彼负责整编，应允给柳部抗日青年学生均发给路费，使其等离开部队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柳部骑兵第一师改为二十九军骑兵第一团，柳被降职为团长。待整编 完竣后，即 偕同一三二师 收复沽源，驻防该地在察东对峙一冬。后因头部受伤，于一九三四年二月赴北平同仁医院手术治疗。住院期间，曾对中共党员于汉伦的眷属予以接济；并找到刘一之又帮助刘到六十七军受训；还营救释放了徐迈伦同志。一九三四年四月，宋哲元把柳润生的部队从抗日前线调回，到察北堵击杨猴子匪帮，杨猴子东窜投敌，柳润生于察北收降杨部残匪并予改编，返抵张垣整训。

柳润生自送张君平、于晓凤、王一夫、张志诚、张子和等共产党员脱离险境后，即与党组织失掉联系。

不忘抗日不忘党

由于柳润生坚持送走了共产党人及爱国学生，宋哲元对他深为疑恨。若非柳妻兄肖振瀛再三代为斡旋、担保，勉强降职使用，不然随时都有被撤处或置死的可能。一九三四年八月，宋哲元名义上保送柳润生入南京国民党中央军校高教班深造，实则是夺取柳之兵权以安置其亲信。柳无奈乃忍痛离开与自己相伴数年的原抗日义勇军官兵，前赴国民党军校学习。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在中央军校受训，蒋介石令“高教班三期学员免后补期，全体加入国民党”。校方当即召集全体学员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并无活动，至七月毕业离校，即与之完全断绝关系。

柳润生被迫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依然心向共产党。他设法寻找党组织，未能取得联系。但他坚信共产党组织能够信任他，估计党组织会派人到他部队去和他联系。为了能达到抗日和寻找党组织的目的，他坚请仍回二十九军。口称送他深造的宋哲元待他毕业回二十九军时，不但未加重用，反将他由原团长降为骑兵第九师二旅六团一营任营长，驻守北平南苑。直到一九三六年第六团团长升迁，才将他升任该团团长。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日军炮轰宛平县城及芦沟桥，二十九军首当其冲。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该军全体官兵，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抗战。柳润生率部英勇杀敌，累立战功。七月八日，中共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抗战，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抗战。二十

九军官兵更坚定了抗日的决心，英勇奋战，杀敌无数，敌军伤亡惨重，这更加激怒了日军。二十九日敌人派飞机轰炸南苑。柳润生带队冲杀敌军，最后全团仅剩战马百余匹，奉命退出北平，改守霸县。八月十一日奉宋总司令命令，反攻成安县。成安县至霸县相距将近千里，柳接令率领骑兵日夜兼程，驰往成安。由于敌人占据平汉线之邯郸，便于增援，且因敌众我寡，部队远道奔驰，集结未稳，便受敌军冲击。激战三昼夜，多次巷战，双方死亡甚重，敌人便使用重炮并以坦克连续冲锋，柳团几至全团覆没。后奉命调至河南中牟县补充整训新兵，被编为第一集团军七七军骑兵第九师第六团，柳仍任团长。

为革命弃官赴延安

柳润生在训练新兵时，待兵如兄弟，生活从不特殊，官兵团结一致，同甘共苦。他很注意对官兵的政治教育，在部队组织歌咏队、读报组，每周还专门向官兵传达报纸所载抗战消息，籍以提高官兵思想觉悟，教育启发官兵的民族思想与国家观念，使之热爱祖国，献身卫国。还对官兵分别进行学、术科教练，以提高他们的军事素养。不料新兵训练未久，柳的计划尚未全部实现，便被调赴豫北修武对日作战。后转战晋南、晋西，绕至河南铁门整训。该旅旅长李殿林认为柳润生对部队的领导、训练方法以及思想教育，近似八路军，对柳极为怀疑，乃电告宋哲元。宋哲元再次将柳润生调离部队，令其到长沙陆军大学四期特训班学习。其时，陆大四期特训班已开学两个月，与他同时有二十五人因参加抗战未能如期报到，军令部指令，待次期入学。柳润生迳赴徐州七十

七军军部，面见军长冯治安，被委为七十七军骑兵第二旅副旅长，暂在军部服务。徐州突围后，柳患病赴武汉就医，适东北抗日将领李杜在彼，柳谈及欲去冀、热、察边区组织东北义勇军。经李杜介绍与周恩来同志及王明接头，后经叶剑英参谋长介绍，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到董必武同志。柳润生历时五年，总算找到了党组织，决心脱离国民党，到抗日根据地去继续革命。叶剑英同志写介绍信让他先到延安学习，以后再赴前方。肖振瀛、冯治安曾到武汉劝阻，柳避而不见。当时平汉铁路交通断绝，柳率领数人乘船赴重庆，由刘澜波同志领到重庆办事处与李延禄见面，在党的指点下，历经险阻，于一九三九年一月才到达延安。

接受考验　重新入党

柳润生被分配到延安抗大东干队学习。有些人认为他过去是国民党团、师级的军官，出门非车即马，还有勤务兵侍候，卫士保护；吃的、穿的，都非一般人所能及。到陕北来参加革命，变成了普通战士，初来是新鲜，估计时间长了他不一定能安心。

估计毕竟是估计。在抗大一年半的学习中，他不但刻苦学习政治理论及文化，以补充自己的不足。还发挥自己军事上的长处，帮助其他同志学习军事学、术科和劈刀、刺枪等杀敌的过硬本领，最初有些知识分子还不大愿意接近他，后来，大家见他丝毫不摆过去的官架子，学习积极认真，和大家一样出勤务，什么脏活累活都干，既能吃苦而且虚心、耐心，平易近人，渐渐地大家都愿意和他接近。因此，他的政治思想觉悟和革命理论、文化知识的进步都很快，成为一名

能经受革命考验的坚强战士。

一九四〇年前后，盘据在大青山一带的周兴武匪帮，不但扰害百姓，对革命的危害也很大。此时匪势较大，牵制抗日力量，斗争形势紧张。党组织了解到周兴武过去原是柳润生部下一团一连的连长，后来叛变了，占据大青山。党便派柳润生去说服了周兴武，这是对柳润生的又一次严峻的考验。

一九四〇年六月，他被分配到陕北公学教务处任军事干事。

经在抗日同盟军工作的党员证实柳润生确系一九三三年八月入党。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多方了解，认为他"富有浓厚的民族意识，抗日民族立场坚定。但他入党未及一月，即脱离组织，既未过党的严格生活，亦未曾受党的长期教育。审查柳润生脱党后的全部历史行动，对党的事业没有损害，对进步事业有帮助（如营救释放徐迈伦，物质上帮助于汉伦同志等进步青年，在部队中贯输抗日思想等）。由于他的出身及社会上的名望地位等关系，以及入党时间短，没有系统地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理论，阶级觉悟不够，党内知识缺乏，只认识到共产党真心抗日的一面，且脱党已达数年之久"等原因，不能恢复党员关系。经过对他两年多的考验，一九四一年一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让他重新入党。为了继续对他培养，一九四一年五月组织上送他到马列学院学习，由于学校改组拨归中央党校学习。

一九四一年九月，党中央为了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调柳润生任军事研究室伪军科科长。

一九四二年八月他被调到晋、绥军区调查局，任命为偏

关塞北分区情报处副处长。在任职期间，他常冒生命危险出入敌占区，收集各类情报，给上级军事部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一九四三年他参加彩林整风之后回调查局工作。一九四四年九月被调到晋绥军区司令部，过河西作马占山的统战工作，因特务阻塞而被送回，仍在调查局工作。（注一）

为革命鞠躬尽瘁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先派遣了一部份干部到东北，建立革命根据地。柳润生原籍是吉林，又曾在黑龙江进行过抗日斗争，熟悉东北的风俗、人情及其他情况，奉命随第一批开赴东北的干部，到佳木斯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

自日寇投降，日伪政府机关随之解体。苏联红军虽然已进驻佳木斯市，但社会局面仍极其混乱，形成无政府状态。市内有张人天等成立国民党佳木斯地区办事处，到处宣传活动，收罗敌伪人员，发展党徒扩张反动势力。并联络伪佳木斯市长段宝坤、汉奸曲子明、冯祖培等人成立“佳木斯地区维持会”（后改为佳木斯市复兴委员会）。一些敌伪职员、警察、特务等正统观念极强，有的观察时局，待机而动，等待“中央军”接收。有的则以私藏或截夺日伪枪支拉队为匪。还有以赵子学、景田为首组织的“中国人民解放委员会”（后改为东北人民民主大同盟）也发展组织，维持地面。市外则有李宗祥、王福等一些匪队为患，城镇乡村居民均受害非浅。时局动荡，人心惶惶。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江人民自治军进驻佳木斯市后，

因国民党驻佳木斯办事处与国民党佳木斯市党部连续进行反人民活动而被瓦解。合江省工委（省委及省政府尚未成立）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成立合江省保安处（后改公安处），以维持社会秩序、保障人民安全。任柳润生为保安处处长。十一月份他上任之后，边组织、边工作，成立一个保安大队。他经常出没于市区，和负责保安工作的干部战士一起侦察、警戒。夜以继日地为维护佳木斯市的治安而勤奋工作。他领导保安处的工作为期不久，佳市的社会治安便日趋稳定，市内匪盗案件日渐减少。

国民党驻佳办事处与国民党佳木斯市党部虽被迫解散，国民党分子仍不甘心失败，其在佳木斯的活动由公开转为秘密的地下活动，疯狂地进行报复。破坏阻挠人民政府建政工作；积极组织联系拉拢地方建军土匪，准备进行武装抵抗；向我政府、军队和机关内部派遣特务分子，刺探各种情报；在街头散发传单、张贴反动标语；组织“铁血青年团”，对我高级革命干部进行暗害。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佳木斯市副市长孙西林同志在市政府（原中央大街福增庆，现为西林大街第六百货商店）三楼工作时，便是被混入革命队伍工作的国民党特务分子邬捷飞等人枪杀的。这一事件引起很大震动，也提高了我们的革命警觉。合江公安处，根据上级指示，决计要破获这一案件，坚决打击国民党特务分子的一切破坏活动。柳润生不顾个人安危，亲身到各处侦察，在公安干部的协助下，于很短的时间内即捕获了一批国民党特务分子，并搜出国民党党旗和大印。许多案件他们都侦破很快，破获得彻底。这期间，除发生了孙西林被刺案件外，基本上保证了佳木斯的安全。

因为他亲自破获了许多敌特案件，为肃清隐藏的敌人作了很多工作，残余的敌特分子都对他恨之入骨，时刻欲置他于死地。

一九四六年三月，他被调到合江军区任副参谋长。听说国民党攻入沈阳、长春，原收编的部队纷纷叛变，到处匪患猖獗。为了便于剿匪，打通佳木斯到双鸭山、佳木斯到牡丹江的交通线，保卫佳木斯的安全，合江军区成立了四支队、五支队。柳润生任四支队队长，何运洪任政委，下辖一团、五团、骑兵团、炮兵团。在方强司令员的指挥下，曾先后到依兰、集贤、宝清、富锦、勃利、绥滨、雕翎等地围剿李华堂、张黑子、孙荣久、谢文东、李延魁（会）、尤达子大股土匪。

柳润生工作严肃认真，生活俭朴。他过去曾多次参加战斗，有实践经验，很有军事素养，指挥作战沉着果断、机智、战术灵活，常采取声东击西和迂回奔袭等办法出奇制胜，累建奇功。他作战很勇敢，经常亲赴前线指挥，能和战士们同甘共苦，对同志诚恳，平易近人，很尊重领导和政治委员，对持不同意见或反对自己的人，从不计成见，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好指挥员。（注二）经四、五支队的围剿、追击，不但打通了牡丹江、双鸭山至佳木斯的交通线，确保佳木斯外围的安全，还抓获了匪首孙荣久、潘景阳、王凤岐、李鸣山、徐臣等人，并乘胜追击，基本剿灭了大股土匪。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左右，他被调到合江省政府搞经济建设，曾任财政厅厅长，建设厅副厅长、实业厅副厅长、农业厅厅长等职。他主要负责抓生产、建设。为了解决农民搞生产缺马的困难，他曾亲自到内蒙买回大批马匹，分给翻身农

民。他任农业厅长时，一上任就抓动力。在修复桦川县田录村（现建国乡）水利灌溉站时，他做出了极大贡献。那时，水利灌溉站的水泵和大型机器有的在日本投降时被砸坏了，有的被拆卸运往哈尔滨，还有些破碎机件被当作废铁卖掉。他四处奔走、交涉，到哈尔滨找回了部分主要机器，并在哈尔滨订购了很多所需主要部件，招聘能工巧匠，由他亲自主抓修复水利灌溉站的筹建工作。为了早日修复投产利用，他带领工人日以继夜地抢修，他吃在工地，有时也住在工地，终于将水利灌溉站修复使用，还筹办了水利农场。此外，他还和副厅长何冰夏季抓农业生产，冬季动员马套子上山拉木头、运枕木，既支援了解放前线，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柳润生突然患病发高烧，病情很重。在佳木斯的革命队伍中，医术高明的医生较少，只好让一个叫张达时的私营医生给治疗。张达时是国民党特务分子之一，他原在佳木斯市开设医院，国民党在他的医院里就曾搞过一些反动活动。因他的医术在当时来说还算是较高明的，合江省委为了争取他、改造他，未对他拘捕，经教育后，仍让张达时给干部、群众看病，带罪立功，张达时给柳润生治病时，他先后给打了三针，不久柳润生就逝世了。正巧东北局卫生部长在佳木斯，听说柳润生病故，也前往探望悼念。经他询问了治疗过程及用药情况，又根据病情和柳润生生前体魄健壮，即使有病也不可能很快就死去，按照他对死者尸体的概略检查和他行医的经验，认为柳的死因不明。为了弄清病症有否误诊及其他问题，当即派人将柳的尸体运往兴山（现鹤岗）卫生部医学院解剖、化验，以便确定死

因。经解剖发现柳的肺部存有油质，又经详细检查、会诊确定，系属医生往柳的血管里注入油类药物，致使血液凝固，确属于被医生利用行医而暗害致死。省委根据这些事实，便逮捕张达时进行审讯，科学的铁证不容诡辩，张达时畏罪自杀。

省委为了纪念柳润生生前对桦川县田录村水利灌溉站修复工作，曾做出特殊贡献，决定将他埋葬在水利灌溉站旁紧靠松花江的高地上，并定为革命烈士。

李延禄同志在《悼念革命烈士诗词》手稿中有悼念柳润生、马识途的诗文，原文是："征战南北除敌寇，山河复旧遇跳梁，虽然未尽兴邦业，一世英杰永流芳"。（注三）一九八四年，桦川县建立烈士陵园，特地将他的尸骨移葬在烈士陵园，并立墓碑，以示表彰。

（注一）以前系根据查阅中央档案馆786号、中央组织部转档285号柳润生自传、干部履历与鉴定书、柳润生同志历史结论等材料。

（注二）一九四五年以后柳润生的生平系根据一九八三年十二月至一月采访方强、何运洪、刘英、李延禄、李范五、李万新、亓导泉、章申、高克、李华阳等同志的材料整理。

（注三）系根据李延禄《悼念革命烈士诗词》手稿本。并附有影印原件两张。

参加李杜自卫军前后

张士荣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向东北各地区大举进攻。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东北的大好河山沦陷于侵略者的魔爪之下。在这国家与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誓死抗击侵略者的号召。这一伟大号召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斗争精神和勇气，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运动的浪潮。在这种浪潮的鼓舞和推动之下，原东北军的一些官兵们也愤然举起了义旗，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李杜的自卫军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自卫军在东北的日子里

“九·一八”事变那年，我正在黑龙江省密山县平阳镇，没什么职业，在镇上打零工维持生活。那时候我结识了平阳镇小学的一个教员，名叫顾明轩，他在我们年轻人堆里算是比较有见识的人。在他的倡导下，我们组织了一个二十来人的抗日救国宣传队。队员当中多数是密山镇的人，因而我们从密山镇开始南下，一路上在沿途的村镇运用撒传单、贴标语、作讲演等形式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在我们来到梨树镇的时候，遭到了警察所的干预，郭所长严辞勒令我们就地解散。我们那些人都是只凭一腔爱国的热忱凑合在一起的，经不起风浪的考验，让警察这么一吓唬，便都乖乖地解散回家了。

抗日宣传队被解散，我心里感到挺窝火，决心投奔抗日队伍。当时，原东北军二十四旅旅长兼依兰镇守使李杜将军率领的吉林抗日自卫军六六八团二营五连驻守在勃利县边界的亚河。当我走到那儿时，从哨卡上走出两名士兵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来投军的。他们又问我家住在什么地方，从哪儿来？我说家住在宁安，从梨树镇来。他们一听说我家住在宁安，便用一种警惕的口吻说道："宁安、宁安的赵芷香不是已经投降日本鬼子了吗？"说着，便开始搜查我的身子，从兜里搜出了一卷日本手纸。

"看样子你不是赵芷香派来的探子，就是日本鬼子派来的特务！"

我再三辩白，可是他们始终不肯相信。他们把我押送到勃利县城六六八团团部。经副团长徐道审问之后，又把我送到驻在依兰镇的司令部。马宪章审问了一通之后，说："你还是到别处投军去吧。"

我垂头丧气地从司令部里出来，在一个小客店里住下了。

第二天，我在街里闲逛，看到一个军人打着小黄旗在招兵。我凑过去试探着问了一句：

"我想当兵，你看行吗？"

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回答道：

"行。跟我来吧。"

我跟他到了营部，被编入到司令部直属炮兵连里当了预手炮兵。

我当上炮兵不久，日本飞机开始轰炸我军阵地，李杜司令命令我们山炮连跟机枪连组成防空队对付日本飞机。赵德

寿连长召集全连会议，让大家想办法。大家一听说要用山炮打飞机，都感到是个新鲜事，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的说，山炮最高只能射四十五度角，怎么能打飞机呢？孙长红班长却说，在地面上筑起磨形土台子，把炮身架起来，就可以提高射击角度。大伙听了之后，觉得是个好办法，于是开始动手修筑了两个土台子。第三天上午九点来钟，来了四架敌机进行轰炸。我们还击了一阵，可是一架飞机也没打下来。赵连长为这件事很犯愁。我向孙班长提出了改进土台子的建议：把原来平面形的土台子改修成锥形，并在土台子周围挖一道两米宽、半米多深的沟。这样既可以提高射击角度，又能够灵活地调转炮身。班长采纳了我的建议。过不两天，又来了九架敌机。我们利用改进的土台子里的山炮予以还击，先后打落了敌机两架。马宪章参谋长到阵地上视察时，满怀喜悦地夸奖我们说："用山炮打落飞机，这是你们的一大创举呀！"接着，他问这一招是谁想出来的。赵连长指了指孙班长和我。马参谋长走到我跟前若有所思地问道：

"好面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

"三个月前，您审问过我。"

听了我的话，他恍然大悟地朗声笑道：

"噢，原来是你呀！那时我差点把你当作奸细捉起来呢，冤枉你啦，老弟呀。你愿不愿意到司令部去工作呀？"说着，他看了看赵连长。赵连长说：

"到司令部不过是耍笔杆子，不是用武之地，还是让他留在这儿吧。"

马参谋长笑了笑，把话题转到别的问题上去了。

第二天，连部召开全连大会，表彰了孙班长和我的事

迹，并且晋升孙班长为排长，晋升我为班长。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抗日自卫军攻进哈尔滨市。那天是星期天，敌军正在休息。我军臂戴红袖章，分乘四十余辆汽车，趁敌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进了城里。当敌人发现我军时，我军已包围了所有的要害部门。哈尔滨行政长官张景惠率领警备队投降，余敌仓惶弃城而逃。

二月四日，敌人以多门师团为主力，在十四辆坦克和九架飞机的掩护之下，兵分三路猖狂反扑。这一天日伪军一连发起三次进攻，但均被我军击退。正在双方鏖战之时，张景惠的两千名警备队突然倒戈围攻自卫军指挥部。在这种情势之下，李杜只好下令撤离哈市。撤出哈市以后，李杜带领一路人马回抵依兰，前敌总指挥王之佑带领一路人马奔往珠河。我们炮兵连跟随王指挥进驻珠河镇。

有一天晚上我在值班室里值班，夜很晚了，王指挥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灯，我走进去一看，他正忙着写反日宣传小册的稿子呢。我看他一个人挺忙的，很想帮他干点什么。

“王总指挥，我帮您刻印啊？”

“好哇，你的钢板字写得怎么样啊？”

“试试看呗。”

王总指挥顺手递给了我一页草稿。我接过稿纸，工工正正地刻了一页。

“啊，你还有这两下子呢？这回我可省了不少力啦。”

“您写完草稿就休息去吧，剩下的活儿我包下啦。”

他走了以后，我一个人连刻带印，整整忙了一宿。天亮时分，他来到办公室，一看我已经订成了册子，一连声地夸奖了好几句。这天早晨他还很有兴致地跟我唠起了家常，并

且赠给了我两本有关炮兵学的书籍：《筑垒》和《教范》。打这以后，他很愿意跟我接触，有时谈论抗日救国的道理，有时讲述军事方面的理论。他那时候已有五十来岁，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军事上很有一套。他待人和蔼，体贴官兵和百姓的疾苦，在自卫军里算是深得众望的将领。他对李杜的为人不大赞赏，说他佛心太大，不宜当军事首领。自卫军攻占哈尔滨以后，张景惠降服李杜时，他曾劝李杜把张除掉，并彻底改编他的警备队，免得养虎遗患。但是李杜没有采取他的意见，致使哈尔滨失守。每每谈起这件事来，他总是慨叹不已。

进驻珠河不久，王之佑接到了李杜让他以自卫军代表的身份到滨州同日军谈判划界问题的命令。日军提出要以滨州为界，以西归日军管辖，以东归自卫军管辖。自卫军官佐们听说王之佑要到滨州同日军谈判，都来看望他，并劝他不要去，怕他遭到日军的暗算。王之佑也明知道日军居心叵测；他认为作一个军人应该是有令必行。第二天上午，他毅然决然地乘车前往滨州去了。我一直陪送到帽儿山。临别时，他怅然地对我说了他这一去恐怕凶多吉少，万一要是回不来，杨耀宗将会接替他的职务，以后可以多向他请教。杨耀宗比王之佑大两三岁，也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军事上也很有一套。他原在二十八旅丁超手下当参谋长，王之佑走了以后，接任了联合军总参谋长。后来到新疆，被盛世才杀害。

王之佑到滨州一去就没有回来。他走了以后，大约过了一个月，日伪军向珠河发起了进攻。于大头（于琛澂）的三个警备旅和五个连队的日军在四辆装甲车的掩护之下，从哈尔滨出发，自西向东进攻；两个连队的日军在两辆装甲车

的掩护之下，从一面坡出发，自东向西进攻。当时驻守在珠河的我军有七七三团、六六八团、骑兵团、冯占海的一个团、还有一部分司令部直属部队，共计一万来人。这次战斗只打了一天，击毙日伪军二百来名，我军驻守的七七三团损失较大，共伤亡一百三十多人。当天晚上，我军被迫撤离珠河，进驻了依兰县。

一九三二年五月初旬，自卫军兵分两路第二次向哈尔滨发起进攻：一路由杨耀宗率领，计划首先渡江攻取珠河，而后奔袭哈市；另一路由冯占海指挥，从松花江南岸直取哈市。当时我已提升为排长，带领山炮排跟随杨指挥奔往珠河。杨指挥率领的部队有两个步兵加强团（六六八团、七七一团）和一个骑兵连、一个警卫连、一个山炮排、一个迫击炮排、一个重机枪排。我们在土城附近选定了一处渡江地点，那里长满了杂草和好多榆树。来到江边，杨指挥召集各部指挥员会议，研究了一下渡江的具体办法。我们的先头部队在附近的渡口控制了两只大船和十余只小鱼船。但是，用船摆渡目标集中，会造成很大伤亡。我提出了一个组成抢渡小组，拽着马尾渡江的办法，杨指挥听了之后，欣然采纳了我的意见。

抢渡小组由十二个人组成，我也是其中的一名。我们一个人牵过来一匹马，先把重机枪、掷弹筒等武器驮在马背上，然后一手拽着马尾，一手拽着左、右两根缰绳驾驭着过江。江对岸有两个团的伪军进行截击，总指挥是一个姓曹的支队长，我军的强大火力把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我们登上西岸时真切地听到一个伪军官向他们的总指挥报告说：

“曹支队长，敌人已经登岸啦！”

那个姓曹的支队长扯出一面黄旗摆了几下，敌军便开始纷纷退却。

大部队渡过江来以后，杨指挥带着二十斤猪肉和十二瓶药酒亲自到营房慰劳了我们。

第二天攻打珠河镇，消灭日伪军一千余人，把尸体堆成四个垛，浇上汽油，一把火烧掉了。这次战斗是自卫军抗日以来歼敌最多的一次战斗。

攻陷珠河之后，我们继续北上。当走入苇河附近时，先头部队六六八团二营被红枪会包围。红枪会约有九千余名徒众，绝大多数都是手持红缨枪和大刀，有枪的为数极少。这些人来自延寿县的黑龙宫一带，为首的名叫张罗锅子。当尖兵营被他们包围时，赵连山营长本来想要打他们，但被杨指挥下令制止了。他说红枪会是老百姓，不能打。这样一来，尖兵营眼睁睁地让他们给缴了械。大部队赶到以后，经杨指挥跟张罗锅子交涉，才把缴去的枪支退还回来，但还有几门炮和几挺机枪始终赖着没给。

正在我们继续北进之时，杨指挥接到了李 杜 司令 的电令，因依兰失守，令其停止北上，迅速进驻梨树镇。后来我们到梨树镇才得知依兰失守的详情。五月十七日，驻守哈尔滨的伪军江防司令沈鸿烈趁我军司令部驻地空虚，率其部协同日军广濑师团分乘六只炮舰顺江而下攻打依兰。我军依兰西侧的花公鸡炮兵阵地被彻底摧毁，损失四门山炮和六门野炮；守军六六六团伤亡一千余人，仅剩下一个营。

依兰失守，第二次攻打哈尔滨的计划随即宣告失败。这时，李杜把自卫军各部一万余人分别集结在三个地方进行整训：一路军集结在梨树镇整训，由马宪章指挥；四路军集结

在勃利县整训，由陈宗岱指挥；五路军集结在佳木斯整训，由李浦林指挥。就在这个期间，一路总指挥马宪章旅长被混成旅旅长刘万奎杀害。刘万奎外号刘快腿，原是宁安县保卫队队长。“九·一八”以后，驻守在宁安县的绥宁镇守使兼二十一旅旅长投降了日本。刘万奎打起抗日的旗号，拉出队伍在四乡骚扰百姓，不久也投降了日本。后来又拉出队伍逃至海林县东莲花泡，派人到依兰用五百两大烟土贿赂李杜的鲁副官，极力要归附李杜。经鲁副官说合，李杜把他的队伍收编为自卫军独立团，后改为混成旅。刘快腿为人狡诈、狠毒而且好色，共有五个老婆。

那时自卫军司令部里新来了一个姓国的参谋长，后来才知道他是熙洽派来的奸细。他为了谋害马宪章，硬说马宪章跟刘快腿的姨太太通奸，并到处散布。为此，刘快腿便对马宪章心怀杀意。他在一面坡被日军挫败以后，退却的路上经过梨树镇时无端地吊打马宪章私放的一个税务官。马宪章闻知此事之后便立即赶到现场。他一到，刘快腿便令其手下的人把马逮起来监禁在德泰油房，到半夜时候就在屋里把他枪杀了。

就在这时，李杜接到三道洞失守的急电。三道洞是自卫军防御日军北进的重要关卡。日伪军出动上千万的兵力和一百多辆战车，突破这一关卡之后，兵分两路：一路向东宁进攻；一路向梨树镇进攻。李杜接到这一消息之后，慌得手足无措。这时候，那个姓国的参谋长早已溜掉。李杜只好依靠作战科张科长。张科长把有关人员召集到设在梨树镇的指挥部里，我也被招去了。共有四十来人，其中还有李杜的夫人关先生。

关先生是女子中学的毕业生，李杜的前妻已故，她是续

弦。她为人刚直爽快。她讨厌“夫人”、“太太”之类的称呼，因此人们称她为关先生。她曾经为了捐助自卫军修建兵器修械所，卖掉了自家的“依兰号”轮船和自己的一付金镯子。有抗日爱国精神。

这时我仔细观察了李杜司令的神态举止。那时李杜已有六十多岁，中等个儿，长园脸，皮肤白皙，五官端正，上唇留有三绺髯。他说话文质彬彬，待人和气。平日里他的两眼很有神彩，可是这时候却显得抑郁而呆滞。

经过张科长的部署，部队立即向虎林方向撤退。他让我和郑副官及警卫连侯连长三个人负责断后，大部队离开梨树镇二十多分钟以后我们断后，部队也开始向北撤退。一路上，在黄泥河子和虎林县的青山河口打了两次仗，双方都没有多大的伤亡。

一九三三年一月，敌人向虎林、密山一带发起进攻，李杜感到兵力难支，率领三千官兵退入苏境。临走时，曾让我和郑副官分头通知四路总指挥陈宗岱和五路总指挥李浦林也要率队撤向苏联。当我把这一旨意报告给陈宗岱时，他却不以为然地说：

“我们不走了。你也别走了，留在我这儿一起打游击吧。”

我听从他的挽留，在平射炮连当了副连长。从此，我便跟他在一起，在勃利县一带打起了游击战。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西托腰子山顶上驻扎，前来追剿的日伪军在山上燃起一堆堆的篝火，躺在篝火旁睡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带领一个班，每人携带两枚伊式手榴弹朝着最近的一堆篝火摸了过去。摸到三十来米远处，砰砰一顿手

榴弹，把敌人炸得吱哇乱叫，当场炸死了五六个。第二天，敌人向山上发起进攻，我们已退到了密山一带。

五月初旬，我们又返回到虎林县一带，在黑咀子打了一仗。这次战斗消灭敌人一个警备团和警备大队，活捉并处决了陶团长和李向山大队长。

八月间，我们攻打宝清县城，毙俘伪军三百来人，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光大烟就有三千多两。我们在宝清县城过了中秋节。所缴获的大烟土全部分给了官兵：士兵每人一两半，班长二两，排长五两，连长八两，营长十二两，团长十五两，旅长二十两。

到了一九三三年十月，陈宗岱总指挥考虑到冬季的给养无法解决，决定退入苏联。十月一日，我们离开宝清县，路经密山县的哈达河子，来到平阳镇西南的金厂。这里紧靠苏联边境。陈总指挥派人越境跟苏方交涉越境问题，苏方表示了同意，并派一个骑兵团到边境线上迎接我们。当我军部队爬上山顶越过国境线时，我转过身来看了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深深地感到一种难忍的愧痛，两眼热泪夺眶而出，不禁自语道：

“祖国呀，我们何时再能回到您的怀抱……”

退入苏联以后

我军从宝清向金厂转移的路上，在哈达河子跟伪军打仗时，我的肘部受了伤。退入苏境以后，苏方军医看到我的伤处已经开始化浓，便把我领进边防站洗伤口上药，并且让我留在那儿继续治疗。

第二天我刚吃完午饭，忽然听到外面吵吵嚷嚷。我走出

边防站一看，好多人愤愤不平地用秽言咒骂。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回到连部问了一下李天申连长。他只说是大官们都跑了，但是更详细的情况他也说不明白。于是我又跑到了营部，副营长刘学山说，苏方把校官以上的军官都用汽车拉走了，拉去干什么不知道。（后来我们才知道，苏方把那些人拉到了海参崴，准备由此再经海路送到上海，但由于日军封锁了北海道的航路，只好改用火车经由西伯利亚送到新疆，所以比我们到达新疆还晚）听了刘副营长的话，我也感到很气愤，因为那些当大官的平常口口声声说的是要“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可是到了这种关键时刻却连一句话都不留就走掉了。但是光气愤也不能解决问题，还得研究出往后应该怎么办。当时我们共有两个营多一点，经过两个营的层层推选，大家把我选上了总代表。从此以后，在各种重大问题上，都是由我出面向苏方进行交涉。

一天下午一点钟左右，苏方用卡车把我们送到了四站。在那儿吃了晚饭以后又上了火车，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左右到达了伯力城。我们在这儿下车，集结在车站广场上吃了早饭——黑面包和苏泊汤。约有八九点钟光景，来了一位胡须皆白，身材矮瘦的汉族老头，说是要见见领头的大官。我走上前去跟他说：

“我就是。”

他用一种疑惑的目光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伸出手来握着我的手亲切地说道：

“你们辛苦啦。我叫王佩显，是远东司令部的。我陪你们一起到西伯利亚去。”

原来他是苏联远东司令部的副司令。又是华侨总会的副

会长。我们在人地两生的异邦见到这样一位同胞，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给我们简单地介绍了苏联的形势，而后跟我们说，要是有黄金、大烟之类的东西可以卖给当地的政府，以便用以贴补生活；要是不卖，一但被搜查出来，就会白白地让政府没收。我把他的这个意思跟大家一说，大家都欣然地把私藏的黄金和大烟拿了出来。我和原二十四旅旅部的齐副官带着大家拿出来的黄金和大烟，跟随王佩显进城卖给了当地政府。一两黄金卖了五百卢布，一两大烟卖了一百卢布。回来之后，把钱还给了个人，而后又让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交出钱来，派几个人到街里买来了面包和香烟。

当天下午四点钟，全体官兵进城洗了澡，而后重新返回车站乘车出发了。王佩显副司令坐在我的对面，一路上跟我攀谈起来。苏联十月革命时期，夏伯阳支队攻打伯力，攻了三天没能攻下。就在这时，王佩显组织了一万四千多人的华侨军队。在王佩显的请求之下，中国方面驻守在虎林的陈宗岱二千余名军队，奔往伊曼城跟王部会师，而后共同援助红军攻克了伯力城。王佩显这次是受苏联远东军区的委托，特意为报答当年陈宗岱所率领的中国军队的旧恩而来的。

我们正在兴致勃勃地闲谈的时候，警卫排长领来了一个华侨模样的人。那个人自我介绍说是远东军区司令马连科夫派来的翻译。王佩显听了他们的话之后沉思了片刻，便吩咐乘务员赶快给那个人找个座位休息。那个人跟乘务员走了以后，王佩显对我说：

“那个人看样子是哪个情报部门派来的，你们不用理他就是啦。”

到了多木斯克，王佩显把我们委托给了当地驻军师参

谋长葛米洛夫，而后便跟我们分手了。临别时告诉我们说，他要给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先生写信，以后要是遇到了什么不好解决的困难，可以向邵大使写信求助。我们在多木斯克一天只能吃到四百克黑面包和半碗苏泊汤。我看大家饿得不行，就照着王佩显的话给邵大使写了一封信。没过多少天，邵大使跟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铁道部部长等人一起，亲自到多木斯克来看望我们来了。在座谈会上，我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我们在东北抗日的前后情况和入苏以后的处境。他听了之后深表同情。他说，凡是苏联政府供应给在苏联境内的中国抗日部队的物资，中国政府都是照价付偿的，所以按理说，苏联政府应当尽量满足供应。在这方面，他表示要进一步向苏联政府交涉。他还跟我们说，保证能让我们在六个月以内回到祖国去。临走时嘱咐我们上下要团结好，搞好军事训练，多学一些本领，以便回国后更好地发挥作用。他走了以后，在伙食和其它物资供应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虽然主食还是一天四百克黑面包，但是蔬菜品种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既能吃到土豆、大头菜之类的鲜蔬菜，又能吃到牛、羊骨架之类的肉食了。在服装供应方面，每人发给了棉劳动服一套，衬衣两套、皮大衣一件、皮帽子一顶、毡筒靴子一双。

一九三四年一月末的一天，苏方通知我们，要把我们送回祖国去。大家听到这一通知以后，顿时欢腾起来，当时那种兴高彩烈的样子是难以言状的。我们打好行装，排好队伍，由多木斯克乘车到纳古斯车站下了车，而后又步行五天终于到达了祖国的西北边城——塔城。

到新疆以后的结局

当我们踏入新疆塔城县境内的时候，正赶上马黑英围攻

塔城。马黑英是原青海省军阀马步芳的侄子，马步芳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围范，派他的两个侄子向新疆发起了进攻：一路由三十六师师长马仲英率领数万人围攻省城迪化；另一路由马黑英率领二万七千人围攻塔城。所以我们一踏上塔城县境，塔城县县长兼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葛应田率众亲自到国境线上迎接我们。我们进入塔城之后，警备司令饶雄也像是盼来了救星似的对我们表示了热情地欢迎。欢迎会上，他十分恳切地对我们说道："塔城数万人民能不能得救，全靠你们啦。"他讲完话之后，立即给我们发了武器：七七步枪和铁力瓦机枪等，都是崭新的苏式武器。在这种情势之下，我们来不及休息，又立即投入了抗击马黑英军队的战斗。塔城分为东、西两个城：东城满族人多，称为"满城"；西城汉族人多，称为"汉城"。因此我们也分成两伙：一伙由何景武副营长和我率领五百多人守卫满城，其余的人守卫汉城。马黑英的军队虽然有二万七千之多，但是军队素质差，武器粗劣，不堪一击，他们自料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开进塔城的第二天凌晨，他们就全部悄悄地撤走了。第三天，饶司令向我们传达新疆省边防督办盛世才的命令，让我们继续追击马黑英部队，把他们赶出北疆。我们奉这一命令追击到乌苏县时，敌人已经退到天山以南的焉耆地区去了。于是盛世才又命令我们到省城迪化待命。就在这时，陈宗岱带领一百三十多名校官以上的军官赶到了乌苏县。这样一来，我们便跟他们一起来到了迪化。

到了省城以后，盛世才对我们进行了彻底的改编：年岁大的被编入到屯垦委员会里从事开荒种地，陈宗岱被委任为主任；年令较大的没有多少文化的编入到教导团里当兵；年

龄小又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送到军官学校深造。至此，曾经驰骋东北抗日疆场的抗日自卫军这一独立的武装队伍，就这样结束了它的历史。

千寿山　整理

累累白骨五顶山

刘文让

五顶山原名卧尔古力山（赫哲语：孤山之意），位于富锦县城南二十公里，当地人习惯叫它东山。它属小兴安岭余脉渡江（松花江）南下部分。东西长、南北短，其走向是西北——东南。最高峰为五百三十八点七公尺，面积为三千二百平方公尺。山北是滚滚松花江；东北、东南的山脚下是同江、抚远、饶河等县通往富锦、佳木斯两条公路的（富同、富饶）的咽喉。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加强所谓"北边震护"封锁松花江，控制富锦重镇，以防御苏军的进攻，一九四二年春开始在五顶山修筑秘密军事工程。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这个世世代代的荒山野岭中，从一九四二年工程开始，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东北解放，共杀害中国劳工二万多人。

神秘的"勘测队"

一九四二年犁杖刚下地，五顶山下突然开来数十辆日本军用六轮大卡车。车上的日本人一律身着土黄色的"勘测队"工作服。奇怪的是这伙"勘测队"不要当地保甲长等官吏陪同，自带翻译（日本人）。仅在山脚下召开了村长会议，翻译用流利的中国话讲：日本关东军派"扶桑社"勘测队到五顶山要进行数年之久的测量，皇军命令："三日内撤出、拆除山里所有的窝棚、马架子、农具、柴炭……三日

后人畜均不得入山，违者开枪打死勿论。”从此，附近村屯便再无一人一马敢进山了。

大约十数天后，便出现了蒙着军用苫布的日本军用卡车越来越多地向山里开进开出。同年秋天日本人又从富锦县城西原“江上军”司令部的口岸，向五顶山修建一条轻便小铁道。等小铁道一竣工，日本关东军便下达了命令：“晚上六点到第二天早六点，沿小铁道两侧的村屯住户一律戒严，人员不准外出，夜晚不准点灯，车马也必须卸套入圈，违者开枪打死勿论。”一九四二年起通过小铁道彻夜不停地把大批物资源源不断运进五顶山。与此同时，从富锦县城开往五顶山的公路上，夜间也出现了大批的蒙着苫布的日本军用卡车，满载着从关里、辽宁、吉林等地抓来的劳工。从此，东山出煤出铁的骗局被人们看穿，人们再也不相信“勘测”的鬼话了。

三个“纸人”

一九四二年秋天，西五顶村西北岗上有一片高粱，长势十分喜人。一天早晨，这片高粱的主人打发一个五十左右岁的长工到地里看高粱的成色。他正走着，突然不远处响起了高粱杆的飒飒声。老人以为是有人偷庄稼，便紧走几步大喊一声：“站住”！随着喊声，突然在他几步远处跪着三个人。说是人也只有三分象人罢了，是三个身穿水泥袋的“纸人”。满面污垢，头发胡子连成片，除两只眼睛外，全身几乎都是黑色。一个个骨瘦如柴，真比庙里的小鬼还可怕。三个人跪着一动不动，混身颤抖，瞪着红肿的眼睛望着老人。任老人怎么询问也无人回答。经老人再三解释说明后，一个操唐山

口音的人（已无法辨别年龄）才战战惊惊地问：“这是什么地方？是中国，还是外国？”当他们知道这是“满洲国”就是东北三省时，一个个才如梦初醒，面部露出一些惊喜。当老人询问从哪来的？是不是从山里逃出来的劳工时，三个人面面相觑，吓的一言不发。只是叩头求饶，要求换衣服，给点吃的，再给指条生路。说罢每个人从怀里大把大把地掏大烟土，做更衣求食的酬金。当知道站在他们面前这位老人是地主家长工时，才承认了是从五顶山上逃出来的劳工。老长工再三叮嘱，白天行走不便，就躲在这片高粱地里，饿了就啃大半浆的高粱头，并答应到天黑时送他们上路逃生。老长工走后，三个纸人一动不敢动，盼着天黑好逃生。

天大黑以后，那位好心的老长工领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悄悄溜出了村。老长工的破蓑衣里包着几件破旧衣服，小男孩提个破“喂大罗”（铁桶），在碎草下边藏着几块两合面的饼子和几块咸菜疙瘩。这一老一少进高粱地后，悄悄地寻找“纸人”。怪了，早晨见到那三人都不见了。又不敢大声喊叫，两个人只好挨垄沟地寻找，足有半袋烟工夫，这三位“纸人”才从三个不同方向悄悄地出现在一老一少面前。原来三个“纸人”对老长工不大放心，唯恐回去报告什么人，因此才隐蔽起来。他们躲在暗处、确实没有发现尾追者后才慢慢放下心。当看见两合面饼子、咸菜时，喜出望外。老长工只准每人吃半个饼子，一块咸菜，怕吃多了他们胃肠受不了。剩下的叫他们留着路上用。在三人狼吞虎咽地吞食干巴饼子时，老长工从兜里掏出一把打马鬃的剪子，为每个人“理”了发。这时天已黑了，但上路还早，老长工令他们再等一会儿，叫小男孩到地头去“放风”。这时操唐山

口音那位才较详细地叙述了日本法西斯在五顶山秘密修筑军事工程，残暴屠杀劳工的悲惨情况，但对他们三人的经历却避而不谈。又粗略地叙说了他们是从河北抓的劳工，一路上全戴“黑帽子”（就是黑布袋），谁也不知去往何处……。最后，老长工详细地介绍了逃生路线以及路上应注意的种种事项，特别是遇到警察特务盘问，就说去富锦割大烟的，正好把身带的大烟土做为买路求生之用。三个人千恩万谢地给老长工叩头，一定要赠送些大烟土，老长工半点没收。望风的小男孩回来告诉外面平静，老长工便指点三人越过横道，钻进了另一片玉米地。

五顶山之谜

一九四二年春天，日本关东军占据了五顶山后，不惜一切代价，从日本国派遣专家，运来大批军用物资，抓来数万中国劳工，修筑五顶山军事工程。

工程的总指挥是一名日本少将（姓名不详）。他一个人有三部小轿车，视察工程一日换数次小车，夜间小车全进入山洞里。看押劳工的全部是日军，驻山下的靖安军不准进山一步，就是伪军军官也不许踏入禁区。

五顶山的工程大致分三部分：一是盘山道。在“内山区”各主峰均有隐蔽的盘山道，汽车能在这类道上畅通。全山的盘山道以主峰（卧尔古力峰）主路修的质量最高。从西小河口到主峰峰顶全部为沙石路，路面也较宽，一年四季风雪雷雨无阻。第二是修山洞子。按需要各山洞的长度形状不一，但每个山洞子全是S型。主要山洞全部打通，山洞内有照明、通风设施，能开进汽车，山洞内的主坑道两侧为30—50

公尺的小山洞。除储存军火外，便是被服、给养……等。第三项工程是修筑各种明碉暗堡。全工程的土建工程如修山洞子、地堡、盘山道等笨重活计全是中国劳工干，一些重要的军事机密工程，则全由日本"扶桑社"的人员亲自动手。

五顶山上的劳工

五顶山的劳工有二万余人，全是外地人。大部分是来自热河、锦州、河北、唐山等地，多是当时抓的"浮浪"，其中也有华北、山东地方抗日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和所谓"政嫌"人员。富锦当地人一个也没有。日本军国主义在劳工们的"启运"之前统一指定地点集中，每个人戴一个黑帽子（两层黑布口袋），将头部套严，无论乘火车还是轮船，不到地方不准摘掉，当时进入五顶山的劳工分两路：旱路是把劳工们装进关东军军用列车（闷罐车）拉进佳木斯火车站，再装进开进站内的军用汽车，连夜运往富锦五顶山。另一路是水路，运载劳工的军用船只，开往富锦城西当时海军同令部港。下船后直接装进五顶山来接劳工的大卡车，当夜送到五顶山。进山到了劳工指定居住的地方，下车后由日军逐个摘掉那大黑帽子。因此劳工不知身在何处，都以为到国外去了。

日本关东军对全山劳工的管理是按区、棚、队、班管辖。全山分若干区，山内由日本关东军统辖，山外由靖请安军骑兵团设防。山内分东西南北四个区，每区设若干棚（劳工住处），每棚住一百到一百二十人，每棚两个队，每队四个班，每班十到十五人（缺额不增补）。穿水泥口袋的三个

"纸人"，便是西四区二〇五棚的劳工。

日本关东军对中国劳工的看押，是每棚有一个日军小队（十到十二人），三到五只纯日本种的狼狗。日军看押劳工的小队分两班，每七天一换班。狼狗白天由日本军牵着，夜间全部放开，想逃出去不用说那些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就是这些大狼狗也无法对付。另外每区中心设一中心大狗圈（有三十多条大狼狗）和一个医务所（实际是屠杀劳工的秘密机构，只有对日军官兵它才是名副其实的医疗机构）。

劳工们的生活是猪狗不如。劳工开始进山时，还能吃上几顿玉米面饼子，继之便是黄豆皮子掺橡子面的混合稀粥。无论冬夏全吃山水、雨水、雪水。最困难是穿的。劳工入棚分班编号后，每人发一套作业服（灰更生布），上衣前后心有劳工本身的号码，这身更生布的作业服一直穿到死。为此不少劳工全穿水泥口袋制的"纸衣"遮体、御寒。这种奇异的怪服，无论盛复酷暑还是三九严寒，一年四季不离身。

出工前各班劳工集合在大棚前"点呼"（点出勤人数及个人号码）后，戴上黑帽子，在日本兵和狼狗的监押下向工地出发，劳工每人左手拉一条长绳子、右手持工具。每班一条绳子，所以常了也就把每班称为"条"或"串儿"。到现场时摘下黑帽子，按监工员的命令劳动。中午一般不出坑口，发给每人两个黑饼子，一块咸菜。因此，劳工都不知道具体作业地点，更无法知道赴现场的往返路途。收工后"点呼"，按"条"戴黑帽子回棚宿营。对劳工监视、看管最严是夜间，睡前"点呼"一次，一律头朝里睡，每五人左脚用一条大绳拴在一起叫一串儿。夜间不许大小便，特殊情况时则一串人起来，同去同归。

劳工的归宿

日本侵略者是绝不会让中国劳工活着出五顶山的。在山内的劳工大致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可以转移工地的。如修盘山道、盖席棚、修筑蓄水池、化雪池、伙房以及干零活的勤杂、开山打石头、打沙子的劳工均可以干完一项工程，转移到另一区去。但另一部分挖山洞、挖秘密军用仓库、修碉堡、地下道以及攻防重要军事绝密工程的劳工，工程结束之日便是全部劳工归天之时。但无论那种劳工，都别想活着出五顶山，只是时间上稍有差异罢了。

日本侵略者屠杀劳工方法之多，手段之残酷，真可谓古今罕见。

劳工的“医务所”

劳工们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吃低劣的猪狗不如的伙食，一年四季穿“纸衣”，住席棚，被折磨的骨瘦如柴，怎能不得病呀？劳工最怕生病。有了病也挺着出工，难友们也帮助瞒哄着，一旦被发觉（多半已卧床不起者），日本兵便拉着送“医务所”，多半是有去无回。劳工们把医务所和狼狗圈看成一码事。如果某人被加上“传染病”之名便成为狗圈里狼狗的食物了。日本人为防止活人被狼狗吞食发出惨叫声，事先给病人打一针，片刻后便逐个投入大狗圈。日本人在山里的所有狼狗很少喂其它食物，大部以中国劳工骨瘦如柴的身躯为食品。个个吃的膘满肉肥，毛管发亮，整日瞪着一双血红的大眼。

贻害劳工的大烟土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劳工如果说有点“优待”，那就是从

入棚编号起，每人每日发一个大烟份，半年后发二个，超过一年的，每日发三个大烟份（约一钱半）。劳工们全染上了鸦片烟瘾，就是离开五顶山劳工区，也无法幸存。说是“优待”、“治病”，实际是慢性杀人。一项绝密工程竣工，三日停发大烟便全棚劳工就地长眠，不用一枪一弹。这些大量的烟土，也是日本开拓团专门为五顶山劳工种植的。

屠刀下的劳工

同一区的劳工，棚与棚是严禁接连的。每棚四周全是电网，日军岗哨居高临下地日夜监视。日本人对劳工的要求异常严格，无论现场干活，往返路上，或去住地食宿，发现劳工稍有违纪、反抗、逃跑迹象，便当着劳工面用日本战刀砍头示众。在干活时对“磨洋工”的，不慎损坏工具的，轻者一顿毒打，重者也照样砍头。有时啥也不因为，日本人酒后“助兴”任意拉出某人砍头杀掉。

惨死于毒药

某一项工程结束，日本人也要开个“祝庆”会，会后要给劳工一顿平日吃不到的好伙食，两合面的馒头，一大碗带油腥的菜汤，两块日本咸菜。劳工们常年不见米面，当然各个狼吞虎咽。可谁知，日本人在饭菜里下了毒药，不等半夜十二点，全棚劳工便一排排，一条条地头朝里，规规矩矩地死去。第二天日本人便讲：“某区某棚劳工得什么样传染病身亡。”为防止“传染”，将棚倒上汽油点火焚掉。

送劳工“回家”

对入山较久的劳工们（幸存者），当某项工程结束后，

便大讲特讲："劳工们辛苦大大的，送劳工回家种地，多多'出荷'。"然后，让劳工们到指定地点集合，点名上车。劳工们要照样带上黑帽子，坐在严严实实的卡车内满山转游，最后送到"万人坑"，一车一车的砍头杀掉。

对临时从山下村屯抓去的车夫、干杂活的人，也从不放过。先用铁丝捆绑双手，而后逐个的砍头杀死。住富锦县大榆树乡宝林村的马运荣（外号马铁脖子），便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被日军抓进山的车夫，日军在撤退前便用战刀砍倒在南山区，这次共砍了十三人。因马的主动脉没砍着，半夜苏醒后，爬出五顶山，死里逃生。

魔鬼悔悟记

袁　　丁

编者按：本文提到的侵华战犯岛村三郎，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到一九四〇年四月曾担任过伪三江省警务厅特务科长兼三江省地方保安局理事官。他担任这一职务共四百二十五天，然而由他亲自或奉他命令残害（包括捕、关、杀、判）的我国人民就达四千三百一十一人之多。

岛村三郎在我国东北其它各地也犯有严重罪行。据他本人供述在他参加侵华十一年中，由他亲自或奉他的命令仅是处死一项，竟达五百人之多；至于捕、关、判则无法数计。

为了征集这份史料，我们查阅了大批有关档案资料；查看了由岛村三郎亲自签字的供词和检举控诉材料；走访了几次大屠杀中的幸存者；查看了大量罪证照片；最后又参看了岛村三郎被我宽大释放后，于一九七五年所著《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

下文就是写他如何由一个侵华战犯，通过我国政府对他的教育，转变成为中日友好人士的全部里程。

一、在军国主义毒液浸润下成长的人

岛村三郎一九〇八年生于日本高知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在乡下还未读完高小就因家庭无力供读而中途辍学，后由一个资本家资助重新就读，于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

国大学经济部，并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岛村三郎在侵华期间犯下严重罪行，是有他历史根源的。早年他出生以前的明治维新时代日本就开始施行军国主义教育，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叫嚣“日本乃万国之本的国家”，以“武力为立国之基础”①。明治政府一建立就叫嚷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②，宣扬“武士道”、“大和魂”精神。在他出生前后的这个年代里，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推行其侵略政策步步得势的时候，继一八七四年侵入我国台湾之后，一九〇〇年又参加八国联军分脏，一九〇四年在我国东北打响“日俄战争”，一九〇六年赢得这场瓜分东北战争的胜利……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骗取本国人民的支持，极尽其歪曲事实之能事，胡说什么中国的革命，使日侨生命财产有受侵害之虞”，“权益遭受侵害”等等不一而足，叫日本人民相信侵略满蒙是保护日本的生命线。如一九二七年七月田中奏折所说的那种“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军国主义妄图征服世界的侵略口号，连当时日本本国人民也无从知晓。

在岛村三郎降生以后的年代里，日本广大人民的灵魂，早被各种谎言谬论所扭曲，“大和魂”、“武士道”精神的毒液，象泛滥的洪水浸泡着他们，天皇成了现人神，“克忠克孝”成为宗教教条，侵略别国的战争成为“为日本民族争取生存空间，奉天皇命令所进行的圣战”。岛村三郎还在咿呀学语时，他所吃的饼干上就有“满蒙”二字。他们的长辈告诉他：没有“满蒙”，你会被饿死的。应该说：在岛村三郎这样日本人身上发生的悲剧，是由日本当权的军国主义者们一手为之编导的。

二、在歧路上起步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日，岛村三郎戴着经济学学士的桂冠，进入伪满造就文官的“大同学院”。半年后，毕业分配到伪满蒙政部被任命为调查科高等官试补。这之后岛村三郎专门从事对我内蒙古地区的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

伪满蒙政部在伪满建立之初，原叫做兴安部，由著名日本大特务菊竹③充任次长。是专门为统治我国内蒙古而设的。岛村三郎在这个机构里初露锋芒，便得他的上级的击节赞叹。

标志着人类文明进步的科学成果，其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它确有一个为什么阶级、为什么人、为什么目的服务的问题。纳粹德国席格蒙·腊切尔博士④把他的知识用于人的活体冷冻试验上。他把活生生的人，赤身放在严寒条件下，观察其等冻僵过程，然后再用各种方法回暖，以解决高空飞行和寒带作战的冻伤问题，为希特勒征服世界的梦想服务。日本战犯石井四郎⑤把他的知识用于人的活体细菌试验上。他把成百上千的中国人一个个送进“试验玻璃罩”里，观察其等注射鼠疫菌、伤寒菌后的病理变化，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细菌战服务。这是科学成就为杀人目的服务的比较典型的例证。

岛村三郎在伪满蒙政部供职期间充分运用他的经济学知识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统治、掠夺我内蒙古人民提供了借口和方法。他在蒙政部供职期间曾先后三次到内蒙古各地乱窜，进行实地考察。他随身携带着照象机、盐水浓度计、军用地图、兵要地志……对这里的土地、工商、畜牧、物

产、气象、地形、人情风俗、宗教信仰……作了无孔不入的调查。曾三次把自己的考察报告上交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有两篇以蒙古地带人口、经济为题的论文发表在专供侵华头目阅读的、内部刊物《南岭》上，为军国主义头目制定统治、掠夺内蒙人民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如他在考察报告上曾屡次提到的"蒙古民族慓悍难驯，宜多提倡亲善"尊重他们的喇嘛教和风俗习惯；还有畅修公路、方便交通以加速物资外运等建议都曾得到日本军方的采纳并付诸实施。由于他对蒙古地区的事务别具热心，"干事有功"，擢升为荐任三等，并走马上任到伪兴安西省奈曼旗担任旗公署副参事官。

三、从"理论"到实践

岛村三郎在日本帝大学习时，师承了十八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斯密亚丹、李嘉图⑥等人的理论。但他并没有象斯密亚丹、李嘉图等人那样把自己的学说用于自己本国的经济发展和振兴上。实质上他在伪蒙政部所干的事情远远超过经济学的范畴，倒多少近于一个"战略思想家"的工作。他的上峰也看准了这一点，有意给他施展这种"理论"以实践的机会。但，文诌诌的"理论"毕竟是纸面上的事。理论对头，做起来则一顺百顺；相反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内蒙古人民并没因为日本侵略者一再表示"亲善"而改变自己"慓悍难驯"的性格，所以岛村三郎一到任就碰到了麻烦。

当时周永久所领导的、有众多蒙古族参加的抗日队伍，总的人数达两千余人并用从敌人手中夺得的轻重、长短武器武装起来，在这一带对敌人进行袭击骚扰。就是旗公署所在

地的周围也常有这支队伍出没。破坏交通电讯、袭击日伪卡哨、打死打伤日伪官兵的事，时有所闻，搞得敌人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一日数惊。这时他才发现光讲“亲善”的“理论”已经不顶事了，于是他才开始了实践。

岛村三郎，在这里所担任的职务，依伪满官制来看，得算是文官，再大一点说他仅有幕后指挥权。可是此时他已顾不得那么许多了，他亲自督战，由奈曼旗警察讨伐大队长伊藤初太郎率领一百二十名伪警，从旗城浩浩荡荡出发，对我抗日队伍进行扫荡。但抗日队伍在什么地方，他们并不清楚。

事有凑巧。周永久抗日队的参谋长宁中孚为完成一项侦察任务只身外出，夜宿王府南十五公里地方的一个荒村，被他们这个望风扑影的扫荡队伍所发现，并有汉奸指认，宁中孚不幸被俘。因此这次扫荡就连获“大捷”而凯旋归来。岛村三郎兴高彩烈，并亲自签署了上报伪恩赏局的请功报告（这份报告以后成为他被审判时的证据）。岛村三郎实指望从宁中孚的嘴中挖出抗日队伍的下落，结果使他极为丧气。在岛村三郎被我宽大处理归国后，一九七五年他所著的《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中，关于这件事情作了如下的描绘：

“宁中孚参谋长在严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没有出卖一个同志。在监禁中，他用铁器割断自己的气管，鲜血流了一地，最后悲惨地死去。”

岛村三郎是“文”武两手交相使用，以后他又带领武装警察下乡“宣抚”，“修建公路，组织模范农场，打预防霍乱针”；就在这个同时又在老哈河畔打死打伤我游击队员二十余人，并在他的命令下就地斩杀一名被俘人员。

由于他“功勋卓著”，一年后又被擢升为参事官，派到阿鲁科沁旗去当“太上皇”。在他的串联下，附近几个旗纠合一起，对我周永久抗日队伍进行联合扫荡。当时我周永久抗日队一支四百余人的队伍，因缺粮而从大兴安岭重返这平原。岛村三郎闻讯又由阿鲁科沁旗匆忙地窜回奈曼，协助他的老搭档奈曼警察讨伐大队长伊藤初太郎率领众多伪警，在西拉木伦河附近的拉麻塔拉汗与这支缺粮队伍展开激战，结果打死打伤周永久部官兵二百余人；在另一次扫荡中抓获我两名侦察兵，在岛村三郎的命令下就地枪决。

岛村三郎在阿鲁科尔沁旗独揽全旗行政大权并握有司法审判权，在短短不足两年时间里，他以莫须有的诸如“抗日嫌疑份子”、“流言蜚语”、“窝藏枪支”、“邪教”等等“罪名”先后抓捕、处死、判刑，共一百六十五名抗日人员和和平居民。其中十八名被处以“极刑”。这还不算，岛村三郎令人在旗公署后山，埋下三根木桩，从十八人中选出三名身强力壮者，分别绑在三根木桩上，他要试验一下自己的“骑术”和“刀法”。他满以为自己会挥刀斩首，人头落地，然而他万没料到，当他挥刀斩下第二颗首级时，突然这颗人头象个抛掷物冲着他的坐骑飞来，他“感到一阵眩晕”……当然，余下的一人，并未因此而幸存下来，是被另外一个侵略者枪杀了。

因此种种，岛村三郎受到伪恩赏局的褒奖，擢升荐任二等，赐五级柱国勋章一枚，调升伪兴安西省警务厅特务科长。

他在伪兴安西省警务厅仅一年多些，就抓捕我抗日人员约近三百名，其中有十人被判处“极刑”，判各种长短有期徒刑二百七十名；抓捕和平居民三百一十名，其中有一百二十

名被判各种徒刑。

岛村三郎后来交待这一段历史时，曾有一段生动精彩地叙述：

> “检察员……不知哪儿拿来三本文件集，然后找出其中的三页：‘怎么样，对这份文件你有印象’？检察员说着，随手递过文件让我过目。我伸着脖子仔细地看着，突然，发现了我用兰墨水亲手签署的‘岛村三郎’几个大字。我惊呆了，长长地‘呵’了一声。这就是我的第一号《请功报告书》……我把在奈曼旗的所作所为，详详细细地写在文件里。为了向主子邀功求赏，获得一枚勋章，我把许多情节夸大了，把芝麻大的事儿夸张成西瓜那大么。”⑦

这份作为证据的《请功报告书》的出现，使当时拒不认罪的岛村三郎大为恼火，他一方面用笑脸应敷着我们的检察员，一方面绝望地暗暗骂道：

> “畜牲！‘恩赏局’的家伙们，连文件都不烧毁就逃之夭夭了。”⑧

我今天写在这里的既不是“芝麻”，也不是“西瓜”，而是岛村三郎在这段时间里，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笔笔有踪的滔天罪行。

四、他有平均每天×十个人的纪录

小标题中的“×”代表捕、关、杀、判。

光阴荏苒，到一九三九年岛村三郎已满三十岁了。他在铺着中国人民白骨的道路上走进了到“满洲国”以后的第五

个年头。

当时伪三江省地方⑨是我东北抗日联军各部活动比较集中而又十分活跃的地带。破坏交通电讯、袭击敌人据点、打死打伤日伪军警政事，时有发现，敌人不胜其苦。于是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岛村三郎便“应运”来到伪三江省警务厅担任特务科科长兼伪三江省地方保安局理事官。

“保安局”是个什么样的机构？连我这个自诩为“有机会领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凶恶残暴的人，在当时也闻所未闻。

日伪原来的宪、警、特机构虽然已够相当庞大；但直到一九三七年其中并没有“保安局”这个东西。实际上，这个秘密警察机构，是被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风起云涌的抗日救国斗争“打”出来的。

众所周知，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九年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领导抗日救国斗争最为广泛、最为激烈、最为活跃的年代。中国人民这种前赴后继的斗争精神，令敌人胆寒。

一九三七年日本关东军有鉴及此，责成它的参谋部第二课片三衷、第三课山国参谋另行组建职能更多、权力更大的“保安局”，妄图用加强恐怖特务统制，来应付这四面楚歌的困难局面。

保安局在名义上隶属于伪满警察总监，实质它是由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直接派出现役高级军官以“参与”职衔进入以实现其领导、指挥作用的。

伪满中央保安局由公开单位的伪中央警察总监星野担任局长；由中央警察总局特务处处长高松兼任参事官，向局长负责，主持全面工作。各省地方保安局（对外叫“特务分室”）由省警务厅长为当然局长，由各特务科长兼任理事

官，向局长负责，主持全面工作。伪三江省保安局，以现役军人，佳木斯特务机关长西原少佐担任“参与”以体现关东军的领导指挥作用。

伪保安局的职能概括起来仅有三条：一是对苏派遣间谍，抓捕苏联谍报人员，刺探苏联的军事、政治各方面的情报；二是镇压、破坏我抗日救国运动；三是镇压、监控日本人民反战的行为和言论。第“三”条职能是其它伪满的宪、警、特机关都不能具有的。它有一条最大的特权，叫做“超法权”，可以不经过任何伪满的法律程序，就地处死“人犯”。

一九三九年二月岛村三郎接替了其前任上村阳太郎的职务，担任伪三江省警务厅特务科科长兼伪三江地方保安局理事官。

他到职后不久即窜去富锦县“督促工作”，命令他的部下广野治郎警尉加强谍报工作。他们在富锦县北三道街哈尔滨旅馆二楼开设“特别谍报班”秘密据点；派汉奸梁银在富锦县北二道街开设“工作旅店”的富锦客栈；用金钱、美女、鸦片、赌博诱捕腐蚀苏联谍报员；实行“北斗星”式、“蒲公英”式防谍办法；提出“阳光无处不照，间谍无处不到”口号，制造紧张气氛，为其滥捕滥杀制造借口。据伪三江省警务厅一九三九年的《思想对策成果月报》披露，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月在富锦、同江、抚远、萝北各地抓捕“间谍”和“嫌疑份子”一百五十余人，其中有五十一人就地处决，其余七十人被送到司法部门判刑。为了消灭罪证，则干脆把“人犯”塞进松花江的冰窟里。

据战犯坂田义正、志田巳一郎的检举，岛村三郎还亲自率

领“特别谍报班”、“搜查班”随日伪军警部队，对我抗日队伍进行扫荡、讨伐。仅在一九三九年夏季一次“随军讨伐”中，由他自己或奉他的命令就地处死的就有三十余人。

一九三九年五月岛村三郎以伪三江省地方保安局理事官名义，报呈伪中央说，由于中日战争引起当地“民心不稳”、“治安状况欠佳”，请求对策。结果当年七月傀儡皇帝溥仪有“北疆巡视”之行。为了迎接銮驾，确保安全，仅在佳木斯一地就抓捕一百二十名“要视案人”。溥仪“回銮”了，然而在这一百二十人中却有三十名莫明其妙地被判处各种徒刑。

一九三九年，在岛村三郎的倡议下，在佳木斯西郊修建一座绝密监狱。这座子立在荆棘丛中高围墙、黑大门的绝密监狱，却挂着“三岛理化研究所”的动人招牌。据在这里当过看守的志田卫一郎供述：“只要关进这里的中国爱国者、苏联爱国者，绝不可能得生。我在佳木斯四年八个月，从未听说到由这里活着出去的事，有着必杀的原则性。”

现在再看看岛村三郎自己对此是怎么说的：

“……保安局的主要官员，不分昼夜地对被捕人员进行刑讯拷问，诸如：坐电椅、灌凉水、用烧红的铁棍烙身体、裸体穿上用厚纸做的衣服，点火烧得惨叫等等，使用凡是能想出来的一切残酷手段进行拷打。为了保守我们这个组织的秘密，审讯结束后，如果再也没用处，不论供词是逼供下的胡言乱语，还是当初错捕的无辜者，都一个不留地在收容所里处死。”⑩

据我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对关进这里的人还不仅仅是“在收容所里处死”，就在岛村三郎一年零两个月的任期

内，就有七人从这座绝密监狱里被送往哈尔滨平房731石井部队去当“马鲁太”。⑪

在这座杀人魔窟里，还发生过许多血淋淋的屠杀中国人的大量事实，因不属岛村三郎的罪责之内，恕不赘述。就是属于岛村三郎本人的罪行，也因篇幅所限，在此只能刊出其中的主要部分而已。

岛村三郎从一九三九年二月到一九四〇年四月，在伪三江省地方干了一年零两个月，屈指算来包括星期天、假日在内共计四百二十五天。在四百二十五天时间里，或由他自己亲自动手、或奉他的命令共抓捕、关押、判刑、杀害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四千三百一十名。这就是说他在伪三江省的任期内每天平均有十个人被“×”了。如果说残害人这种罪恶行径，不能以“抹零去稍”宽厚态度对待之，那么，还有六十一个被他“×”的人没有计算在内。

岛村三郎如此大动杀伐，到底有多少手持武器的“抗日人员”与之对抗呢？据可靠史料记载，岛村三郎在伪三江省任职期间，原在小兴安岭、张广才岭及松花江下游两岸积极活动的我抗日联军各部（包括六军、三军、九军、十一军）已胜利地进行了西征，转移到海伦以西五大连池以东的广大地区活动，其中周保中、李兆麟部已撤到苏联境内。“抗联”各部临撤出原活动地区时，确曾留下部分小分队，其总人数也只有几百人。那么被岛村三郎抓获的四千三百余名“抗日分子”又从哪儿出来的呢？！岂不怪哉？

其实不怪！

岛村三郎的罪恶行径并不象唐吉诃德先生那样，基于理想的侠义而向风车作战。相反，他是出于“除良安暴”的侵

略需要而滥杀无辜以赢得一枚又一枚勋章。

五、鲜血染红白雪

一九三九年，我“抗联”第二路军在哈尔滨以西至牙克石一线以及位于哈尔滨西及西北方向的三肇（肇州、肇源、肇东）地区的对敌斗争十分活跃。在一九四〇年十月底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一项计划得异常周密的军事行动付诸实施：

第二路军徐泽民十二支队一支精悍的小分队出敌不意攻占了托古村，拿下了伪警察派出所和伪村公所缴，获部分武器之后焚烧了警察派出所及村公所。

周围各地军警闻警后立即驰援；另一支由徐泽民支队长率领的部队乘机占领了丰乐镇，攻克了警察署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驻三肇各地日伪军警单位纷纷出动，从各个方向向丰乐镇奔来，企图一举将我这支抗日部队消灭于当地。预先埋伏在肇源县城周围的我二路军主力部队，见城内敌人浩浩荡荡、耀武扬威地向丰乐镇方向飞奔，乘城防空虚，一举占领肇源县城，击毙日本官吏十三名，烧毁了伪县公署，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然后安全撤退。

三个月后，由第二路军第十二支队的张铭同志率领的一支小分队，在肇州境内一次狙击战中又击毙了伪滨江省警务厅警备科长渡边警正。

我第二路军在梅津美治郎⑫“后院”放起的这把大火，简直叫关东军当局目瞪口呆！

此时日本军方正在秘密酝酿太平洋战争，实指望从这块苦心经营长达九年之久的殖民地里抽掉大批兵力去进行另次

赌博，对此，自然不能无动于衷，于是疯狂的报复行动接二连三来到三肇地区。被视为“干将”的岛村三郎又“应运”来到伪滨江省肇州县担任副县长的职务。

近百年来，日本军国主义，一直把“大和魂”、“武士道”精神，吹得天花乱坠，仿佛只要有了它一切就可迎刃而解。其实，日本军国主义者如果愿意找机会听听自己这些“武士”的心声，也许能从中得到教益的。看看岛村是怎么想的：

“一九四一年初，突然接到调我任伪滨江省肇州县副县长的调令，当时的肇州县不断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袭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愿去这危险的地方。然而，拒不赴任，就会被视为臭不可闻的懦夫……”⑬这段自白，称得起

“情真意切”了——不是不懦，而是怕“被视为懦夫”的。

岛村三郎到肇州县时，“放火”之事已经过去了很久了，轰动一时的“三肇事件”其实质，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滥捕、滥杀无辜以泄愤，或者叫做“杀鸡给猴看”。

岛村三郎到职时肇州县的监狱、看守所以及其它可以关押“人犯”的地方都关满了人。这时击毙渡边的张铭和他的爱人也关在这里。日伪官吏昼夜不停对这些人进行严刑拷打，进行所谓“深挖细找”。更不幸的是，在岛村三郎到任那天，我第二路军第十二支队长徐泽民同志在青岗县境内某地遭到讨伐部队的围困，战斗到弹尽粮绝，最后被俘。

张铭烈士的爱人，在一份对岛村三郎的控诉书中，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岛村三郎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穷凶恶极的

凶相，详细地叙述了我抗日战士在生命攸关的危急时刻，所表现出的宁死不屈、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慨。她说：

“我戴着脚镣被拖进院子里。我的丈夫被仰面朝天地绑在院子里一架梯子上被灌凉水。他一面痛苦地喊叫，一面左右摇摆着头，极力不让水灌进嘴。但是无济于事。……眼看着他的肚子大了起来……不一会儿，我丈夫就动弹不了了。我用双手捂着脸不忍再看……”。⑭

于是一个面目狰狞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立即掰开她的手对她嚎叫道：“怎么样？要是不招，对你也这样。”这时另一个日本鬼子用泥靴踩在张铭同志的肚子上，噗的一声，水从“我丈夫嘴中喷泉似的喷了出来。”⑮

在张铭同志苏醒过来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正在威胁他的爱人：“……如果不说，还叫你亲爱的丈夫喝凉水。”

被绑在梯子上的张铭同志，面对被折磨得形销骨立的、誓同战斗到天明的爱妻，在这撕肝裂胆的生离死别的严重时刻，他所表现的不是柔情似水的哀怨和惋惜，而是一个抗日战士对祖国、对人民真挚热爱的宏大胸怀，他严肃地告诫他的爱妻：

“不要说……即使剩下你一个人，也要保护更多的同志。”他那戴着脚镣的妻子坚定地频频向他点头。

面对这宁死不屈的一群，敌人能有什么办法？岛村三郎在我特别军事法庭上供认：

“我到任不到两个月，就不得不对以张铭为首的近三十名被捕人员执行枪决。”

一九四一年的初春三月，这三十名抗日人员慷慨就义。

一场在这个季节罕见的大雪，为肮脏的三肇大地披上耀眼的银妆，刑场就设在肇州城南一公里半的雪原上……

一九五〇年《松花江日报》曾以头版头条的位置，用《肇州城外鲜血染红白雪的三肇惨案》的标题，详细地报导了这个事件的全部经过。

一九四三年五月，岛村三郎因“屡建功勋”调升为伪中央保安局调查科科长。到“九、三”日本投降时为止，他在我国东北整整干了十一年。以后，在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有所悔悟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自白：

“……虽然没有来得及详细统计数字，但大概估算一下，我在侵华期间，直接和间接杀害的人数，已达五百人之多。任凭我有多少脑袋也难以抵偿这笔血债。”⑯

可是，他初进我战犯监狱时，还觉得自己是“无辜”的呢……

六、“大和魂”阴魂不散

岛村三郎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在长春被苏联红军生俘，之后，在苏联伯力边区服劳役五年；一九五〇年七月被引渡我国，与其他战犯一起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监狱里。从此，以“895”号代替了他的原名。

岛村三郎在到抚顺战犯监狱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表现得满不在乎，拒不认罪，认为自己在侵华期间犯下的种种罪行，只不过是一个下属执行上级命令的结果，并且以嘲弄的口气反问我检察员：“如果说战争的责任由我来负，岂不是很滑稽吗？！”他又说：日本人来到东北，是想把满蒙人

民从军阀暴政下解救出来；因为某些人不理解“日满亲善”的真意进行骚扰，才引出了悲剧。当他这些冠冕堂皇的词令被我方检察人员驳得体无完肤时，他也不是低头认罪，而是越闹越凶，被我称为“极反动分子”。他在监狱中高声大嚷，干扰其它战犯休息和学习，多次侮辱我看管人员，寻死上吊拒不交待罪行，最后发展到串联三十余人联名向毛主席、周总理上书抗议，并且由他亲自执笔起草。

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专政工具的监狱，并不缺乏处理这批在押战犯闹事的手段。而我们却没采用“带下去叫他们清醒清醒”的简单粗暴的办法。

我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摸清了他们的思想活动脉络，把“治病救人”、“对事不对人”这些对待革命队伍内部犯错误者的原则，也体现在管理、审判战犯的工作上。发现这批闹事的人，尽是将校一级的战犯，有两种主导思想在支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活动：一是他们资历较深，受军国主义熏陶较重，“大和魂”、“武士道”的阴魂在继续作祟；二是他们认为自己罪恶深重，反正无法获得中国政府的赦免，闹与不闹都得一死，死囚思想在作祟。

这个估计的正确性为后来岛村三郎自己所证实。

当岛村三郎执笔起草“抗议书”时，明知道带头闹事是要罪加一等的。然而他却持破罐子破摔的态度，绝望地哼着敢死队上阵时的歌词：“开放着的樱花，残败着的樱花，都是要凋谢的樱花！”反正终归得“凋谢”又何乐而不一闹乎！

针对他们的思想实际，有我战犯监狱的孙中校、金源少校、吴大尉、崔中尉、张中尉等二十名军官参加，由吴大尉把闹事的三十余名战犯“请”到大礼堂召开了座谈会，希望

他们各抒己见。

我战犯监狱，期待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交待我对战犯的各项政策，促使他们回心转意，认罪服法；不料，树欲静而风不止，岛村三郎领先发言，接着伪哈尔滨高等法院次长横山光彦和伪关东州检察厅检察官田中魁等六人相继发言。他们口口声声叫喊着“抗议”，以熟谙陈旧法理的姿态，提出什么“国际法”，又什么“海牙公约”，最后的结论是：“长期关押我们是违反国际法的。”⑰

坐在主席台上的我国军事管教人员，险些被这伙以疯狂的气势，用有条不紊的语言所讲述陈词滥调气乐了。孙中校用气愤夹着幽默的口气反问：“你们有资格谈‘国际法’吗？你们今天提到的这个‘国际法’早被你们的种种罪恶行径践踏无余了。”接着孙中校列举了大量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仅一九三二年发生的平顶山惨案，一次就有三千余名手无寸铁的中国和平居民惨遭集体杀害；仅南京城一地就有三十五万人惨遭屠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南京城内的妇女“多数都被奸污”，上至七十六岁的老太太，下至十一岁的小女孩都不能幸免……干过这些罪恶勾当的你们，今天还有什么资格侈谈“国际法”！

最后孙中校向他们严肃地宣布：“在你们面前摆着光明和黑暗两条道路。选择哪一条取决于你们自己。你们前几天提交的抗议书，内容是完全错误的，我以所长的职权宣布予以没收。”并把领头闹事的七人分别关进单身监房。四天后又把他们送回原监房。

七、在真理的召唤下，恢复了人性

岛村三郎从处理这起事情中，看到中国政府在对待处理

人的问题上所持的郑重态度，体会到人道主义的精神实质，与他过去处理中国人时的种种暴行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时他才在新生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并不是没有反复。

我战犯监狱，对这批战犯进行耐心的教育，组织他们学习《政治经济学》、《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著作，又组织他们到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参观，这些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认识。

一九五三年的深秋，我最高检察院对关押在抚顺战犯监狱里的战犯开始审讯。在以后一段时间里岛村三郎常被提审。岛村三郎对这些年轻的检察员很瞧不起，认为这些人仅具有一些常识性的抽象的理论，沿着这些论点争论下去是找不到结论的。他万没料到，他这个自命有系统理论知识的人，却常在"抽象的理论"面前一再卡壳。有一天审讯时，岛村三郎发表了一篇结构完美、措词严谨的"宏论"，他说：

"……虽然现在成为中国人民痛恨的对象，但那时我们想的确实只是亚洲各民族的大团结，完全是为了把亚洲各民族从军阀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不亚于欧洲各国的、有高度文明的新亚洲……是因为有许多不能理解日本真意的中国人煽动人们进行反抗"才酿成悲剧的。⑱

年轻的检察员立即表示：中国人民完全能够理解日本的"真意"，只恐怕你在当时还不十分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真意"所在，这也就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悲剧的根源所在。接着，年轻的检察员用质朴的语言向他举个例子：

"你仔细想一想，假如你有个邻居，因为生活贫困而闹得家庭不和。有人去干涉这个家庭，又借口邻

居不服从劝阻而把人家的男孩子杀了，把女孩子奸污了，还抢走了他们的家产。你说，这个人所做的事情是神圣的吗？！”

岛村三郎无言以对。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提审中类似上述的争论时时发生，岛村三郎终于发现，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头脑中久谋而成的条条防线，已被年轻的检察员们逐个地冲破。使他逐渐认识到自己在这场侵略战争中应负的罪责；明确了这场战争的实质在于它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为市场、原料、劳力等问题，要求重新瓜分世界所进行的战争中的一部分。自己当了日本垄断资本为转嫁经济危机而进行的战争的炮灰，结果是既为中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也为日本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接着检察员把他那厚墩墩六册案卷交给他，叫他逐页仔细阅读。审讯已经进入高潮。因为他对自己的过去有了悔悟，所以再也不能用满不在乎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了。他用九天的时间仔细地阅读了卷帙浩繁的检举书、控诉书、证言材料。自己在侵华期间侮辱、虐待、屠杀中国人民种种景象跃然纸上，躺卧血泊中死难者仿佛就在眼前，唤子呼夫的悲惨喊声不绝于耳。特别是其中有个儿子被他杀害的、七十五岁的杨老太太那双哭肿了的双眼，时时在他的面前闪现。这时岛村三郎万分痛苦，时时痛哭流涕，寝食不安。用他的话来说，他在“恢复人性”。

正在这时，他接到国内妻子的来信，得悉家中的生活十分艰难，妻子当街头小贩，女儿为别人看孩子，儿子铁彦死于车祸。闻讯后他“肝胆俱裂，泪如泉涌，痛不欲生。”他从自己国内这个侧面见到罪恶战争带来的严重后果。我战

犯监狱，及时地发现了因家庭变故给岛村三郎身心上带来的沉重压力，由崔中尉对他进行劝慰，主动地免除了他劳动，还叫厨房供他小灶伙食，这使岛村三郎进一步体会到死于自己屠刀下那千万中国人民的父母、妻子、儿女当时的悲恸感情。而中国政府对待自己这个百死难赎的罪身又是如此耐心教育、挽救，实行人道主义。从此，岛村三郎认真检查自己犯下的种种罪行，一五一十地向检察员交待，主动配合审讯，争取早日结案。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对以伪满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为首的二十八名日本战犯开庭审理。当审判长贾潜代表法庭历数岛村三郎罪状时，他匍匐在地，频频叩头，向法庭、向中国人民请罪，诚恳地请求法庭处他死刑。⑲

我特别军事法庭根据岛村三郎在侵华期间犯下的罪行，结合他本人在改造期间的具体表现，从宽处理，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于一九五九年提前释放，遣送回国。

八、他是真诚的友好人士

岛村三郎先生回国后，不顾某些人的非议，不违初衷，积极参加日中友好活动，积极组织筹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正统）”。组成后自任会长，并担任日中友协理事职务，为日中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奔走操劳。不幸于一九七六年因病逝世。他所著的《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在日本引起广泛反响。岛村三郎先生满怀深情将原著寄给当年在抚顺战犯监狱担任副所长的金源同志。《啄木鸟》杂志，在一九八四年第

四期上转载了由金源同志翻译的中 文版 的《中国归来 的战犯》，并用“卷首语”形式向读者作了简单介绍，现摘录其中一段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我们发表了岛村三郎的《中国归来的战犯》，有趣的是，作者正是当年的侵华的日本战犯，而译者金源是原战犯管理所所长，作者满怀深情厚谊赠书给金源，金源又亲自执笔将书译出发表，这本身就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

注：

①、见井上清著《日本的军国主义》第二册中印本6页

②、见日本《明治文化全集》2卷33——34页。

③、菊竹是日本间谍，被日本军国主义者称为“蒙古通”，公开身份是郑家屯满铁公所所长，“满洲国”建立后曾任第一任伪兴安局次长，后在长春办蒙文报纸《青旗报》，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统治蒙古充当喉舌。

④、见《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的第1347——1351页。

⑤、石井四郎系侵华战犯，日本军医中将，731细菌部队部队长。在哈尔滨南平房一带设细菌工厂。曾用大批我国人民做细菌活体实验。

⑥、他二人是十八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他们的学说对当时欧洲经济发展发生过影响。

⑦、见岛村三郎的供词。

⑧、见岛村三郎的供词。

⑨、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一带。

⑩、见《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

⑪、“马鲁太”系日语原木的意思。日本７３１石井细菌部队，对将作为活体试验的我方人员的代称。

⑫、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

⑬、见《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

⑭、见岛村三郎案卷的控诉书部分。

⑮、见岛村三郎案卷的控诉书部分。

⑯、见岛村三郎案卷的控诉书部分。

⑰、见岛村三郎案卷的控诉书部分。

⑱、见《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

⑲、中文版的《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有此插照。

魔窟脱险记

何钟渊

编者按：本文中提到的“三岛理化研究所”是伪满三江省地方保安局下设的、关押政治要犯的一座绝密监狱。在日本帝国主义溃败前夕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十二日两天里共在这里杀害抗日爱国志士五十四人，有十四名被害者被砍去头颅，至今仍然不明他们的身家姓氏。

这次大屠杀是由伪三江省地方保安局局长北原下令，由日本特务桥本喜太郎、佐藤正、熊井光男、谷口传三、高桥大郎执行的。

本文作者何钟渊同志，是在这次血腥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四个人当中的一个。他的记述仅是他个人在不到两天时间里所经历的血淋淋的事实，它仅是这座魔窟的一个侧影而已。

一、被捕前后

我叫何钟渊，原名何家训，一九四一年毕业于奉天铁路学院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佳木斯铁路列车段工作。在乘务当中得识检车工人李广德，他是一个有远见，有抱负的青年。我们很谈得来，他下班后常到我家来。我妻子夏凤鸣见他健谈，举止不凡，对他印象很好。

开始由于相互借阅一些进步的小说看，感情日益融洽，继而成了好朋友。因为当时东北地区处于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之下，广大人民群众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们都对现状不满，谁也不甘心当亡国奴。所以一谈起国家大事时，就唤起了彼此的爱国热情，流于色表，在反满抗日起来斗争这个问题上引起了共鸣。经过一段时间试探，他认为我靠得住，最后他才向我道出：他是国民党吉林省党务专员办事处第三督导区一〇八支部的书记长，他以负责人的身份，希望我也能参加国民党、参加救亡运动。一个在黑暗中徬徨的热血青年一旦见到了光明的线索，使我激动万分。便于一九四四年二月某一天，在李广德家里举行了宣誓仪式，由上级党部来的特派员任子谦监誓，宣誓加入了国民党。之后，开始了地下活动，因为当时是抗日统战时期，我们只传递一些《东北公论》、《三民主义》等小册子，同时也传递一些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和八路军在敌后展开游击战，巧妙地打击敌人的猖狂进攻等抗战事绩。凭借满腔爱国热血每当下夜班回家吃过饭放下碗筷就立即动手，复制抄写六十四开本的宣传手册；有时妻子看我实在太累，就披衣下床替我抄写，因此，常常抄写到黎明时刻。心里总是在想为了祖国做一点事情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同时又常借助乘务之便做点小买卖，用赚来的钱还买过国民党发行的建设公债借以聊表赤子之心。我参加国民党后，李广德常对我说，要有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游击战的思想准备，因为打日本鬼子就得有武装。他布置我要积极挑选一些有抗日愿望又带有武器的人参加国民党。于是发展了两名地下党员，一个是佳木斯铁路警护团的中士刘信荣；另一个是晓云街警察派出所（铁路住宅区）的警士

刘才。

正当我们积极开展地下抗日活动高潮的时候，一九四四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国民党地下组织遭受破坏的"五、二三"事件，在东北有二千余名国民党员先后惨遭逮捕和杀害，我于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也被捕入狱。李广德是先我十天入狱的，事后，才知道他被捕后受尽了严刑拷打，他为了保护组织，营救同志，给尚未被敌人发现的人创造逃跑机会，于是他在审讯中，向敌人交出了好几个亲日派汉奸走狗之类的人。十天后他认为我能有充足的时间跑了，于是才向敌人交出了我的名字。而我呢，认为我们之间是患难与共的同志，他绝不会交出我的。因此虽然知道他已被捕，却没有出走的意思，还准备找门路设法营救他们。

我被捕那天，铁路住宅区派出所警士国民党员刘才得知市特高课要查户口，他意识到事态不好，就在六月二十八日的上午求人给我家送一纸条，叫我快跑。因为那天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临走又没告诉地点，妻子干着急，找不到我的去处。当晚我到家时，发现家里房前房后已被日警特务包围了。跑又跑不出去，我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屋去。这时刘才见我没有走，急得满头大汗。我当即被日警带上手铐，敌人开始翻箱倒柜进行大搜查。看到刘才他那发抖的手，擎着手枪，虎视眈眈地对着日警，跃跃欲试。我妻子见势不好，便以身挡住了他，示意不可蛮干，因为在那种情况下，独虎怎能挡住群狼呢！

二、狱中生活

在佳木斯市中心的日本特务机关"北新寮秘密拘留所"

受的五十多天铁窗之苦，真是纸笔难书啊！住的是臭气蒸人不见阳光的阴暗潮湿的牢房，吃的是食不饱腹的糠窝窝头，大咸菜和盐水汤。那里日夜有持枪武装特务站岗戒备森严，一天只放一次号。一次次的审讯一次次的受刑，除拳打脚踢这些“常规”刑讯之外，有时还被压杠子，上大挂。尤其灌凉水最为难受，昏了过去又往脑袋上浇凉水逼我交出组织情况和发展了多少党员？我坚持说我参加的日子短还没有来得及发展党员，始终没有交出刘信荣和刘才，因此他俩也就幸免了牢狱之灾。我父亲为了营救我，托人给那个高桥日本特务审讯员送去一些礼物，这个特务受礼之后就再也没有刑讯我。不几天又有二十多名朝鲜族青年被捉进监狱，据说也是政治犯。在我的同监舍里有一个共产党员，他经常向我宣传一些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并鼓舞我要敢于斗争，不要泄气，日寇很快就要完蛋了。并说我们的反满抗日斗争，一定会得到最后胜利。特别是他说苏联在革命成功后的生产和生活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今天的苏联就是我们的明天，若想过好日子，就要向苏联学习。在那黑暗的没有出路的牢房里真是万心俱碎，有他这一番话启示，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希望，使我在精神上得到了莫大的宽慰。遗憾的是我没有记住那个人的姓名。

三、被屠杀前后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对日宣战。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上午，日寇把我们三十多名政治要犯，一起押上一辆大卡车（这些政治犯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上面蒙上严严实实的苫布，象拉牲口一样，一气把我们押送到佳木斯郊外一座

绝密监狱里。(以后才知道这里挂着“三岛理化研究所”的招牌)。分别关押到各个监舍，一个房间关两个人，整整一天没给饭吃，也没给水喝。在这一天里，日本看守几次来巡视检查各牢房的动态，监视我们，布置得十分森严，全监鸦雀无声。当天深夜有一个穿便衣的大高个带眼镜的日本特务出现在我们监舍门前，大呼一声“タテ！”（站起来的意思）随着叭叭连放数枪，把我们击倒在地。当时我的神志还很清醒，听着爆豆似枪声在监狱的各处响起，自然意识到这是大屠杀开始了。过不多久，监内又死一样的寂静下来，可叹啊！我们这些爱国志士，就这样一声不响地壮烈地牺牲在敌人秘密大屠杀罪恶的枪口下。我眼望身旁还没来得讯问姓名死去的同志，又摸摸自己流满鲜血的脸，弄不清伤势多重，只是怕流血过多，倒下去无人拯救就不好办了。于是把监舍里的毯子撕成条条，将头缠住，草草包扎好，又下意识看了一下高墙铁窗。不禁心想我不能坐以待毙啊！我已是整整一天没有吃一点东西啦，不仅又饥又渴而且从包扎的伤口又不断渗出血液，就此下去，只有死亡别无他路。我勉强支持着无力发抖的身子，攀着铁窗，去拆窗框边的砖头。因掉下一块砖发出响声，惊动了邻间监舍里的人，他在敲打墙壁向我问话：“你是谁？在干什么？”我从声音听出他是李广德！我的同志，我的亲人，在极端绝望的困境中，这亲切的声音给了我力量和安慰！我告诉他我是何家训，在扒窗户，想逃出去。并告诉他：“你可以扒开墙壁，从墙洞过来，我们一起逃走吧！”他用微弱无力的声音说：“我身中七、八枪，已经不能行动啦！如果你的伤轻、能行动，可赶快逃出去。”后来又来了一个日本特务来复查执刑情况，我听到脚

步声立即倒在地上装死。那个日本特务发现铁窗框一角的砖掉下两块，又见我躺的位置变了，头上还缠了毯子条。便冷笑的说："死了的没有。"随后叭的一声，这一枪从我右后耳根射进，从左嘴唇窜出。继续叭叭地响了一阵乱枪，刽子手便扬长而去。当我再次由昏厥中苏醒过来时，窗外呈现一片黎明前的漆黑，我张一张嘴，真是上天保佑，幸好还没有伤着骨头，我又挣扎起来去攀铁窗户继续扒墙。这时手已出血，身也无力啦，便拼命地往外推铁窗框，最后终于从窗框旁挤了出来。然后走到李广德的监窗下，敲窗召唤李广德，告诉他，要救他一同出 去。李呜 咽了，有 气无力 地告诉我说："我身中八枪，伤势严重，已经不行了，我身边处于昏厥状态中的共产党员也命在旦夕，这里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一旦鬼子窜回，或者有汉奸特务到来，又会遇到新的危险……"李广德又昏厥过去。

当我艰难地走到这座群众称之谓鬼门关的大门前，见大门是虚掩着的，此时万籁俱寂，我悄悄地走出去，不见行人。当时我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再看一下自己身穿的囚衣，脸肿得象个大窝瓜，混身是血，怎敢 见人。好在是 夜深人静，忐忑的心反而安静多了，于是我朝着前面有微暗的灯光处艰难地走去……。真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啊，意外的是前面竟是西佳木斯火车站。更幸运的是这时来了一列煤车，我赶忙爬上去，躺在煤车上，随着列车北行离开佳木斯。当列车开到莲江口车站时，我急忙爬下车，趁着黑夜沿着铁路沿线一气走到半截河火车站的何线路工长家。他见了我这个血肉模糊死里逃生的人，很赞赏我的爱国行动，热情地为我做饭吃，倒水喝。正巧他家还有红伤药，他们赶忙给我擦洗了伤

口，上好了药，又吃了接骨药，并告诉我说："日寇已经完蛋了，但市里还很乱，你就暂时在这里安心的养伤吧！养好再回家吧！"我是脱险了，可家里却闹翻了天。

我妻子在八月十三日那天和我的同学于景贤，冒着头顶日本飞机扫射的危险，去西佳木斯郊外为我收尸。他们找到日本特务警尉王景环的家，他说人已死了，是关东军干的。妻子悲恸欲绝，眼含热泪，到处找我的尸体，自然是没有结果的。年轻的心地善良的妻子她虽然认为我已经死了，却不敢把实情告诉我那年迈的双亲。已经身心交瘁的老人，怎能经得起这沉重地打击！怎么办？她强忍住内心的悲伤，擦干了脸上的泪痕，迈进了家门告诉二位老人家，说是日本法西斯开枪后就匆忙逃跑了。在死人堆里没有找着我的尸体，他可能逃出去了。即使这样，妈妈还是大声的痛哭起来。确信我已死了的她，内心悲愤已极，却要在二老面前强颜为欢。可是到了夜深人静时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思念之情了。她悄悄地在院中烧香祭奠，祈祷上天保佑，希望我能安然归来。现在回忆起那一幕幕的悲惨情景，怎能不使人心寒胆战伤心落泪呢！

八月十五日我支撑着伤残的身体，加入了当地群众欢迎苏联红军的行列，满怀激情地欢迎路过半截河车站向佳木斯挺进的苏联红军摩托化部队。这场面真是激动人心啊！一群一群的群众，欢呼着口号，真是热闹非凡。八月十六日我告别了救命恩人何工长的全家，沿着铁路线渡过松花江返回了家。年迈的双亲看我果真回来了，高兴得杀了一口猪，请街坊邻里和我的同事、同学都来吃喜猪，共享这劫后余生团圆之乐。

四、再回绝密监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我和妻子去市内达时医院给我的伤口换药，然后去启哲医院看望了李广德。我们见面后难过得抱头痛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是在十四日上午和他同监房一个共产党员爬进荆棘丛中，后被一个叫李长青的人救走。那位共产党员据说被苏联卫戍司令部接走。听说还有一位国民党一一〇支部负责人张玉书（张人天）也脱险得救了。之后李广德叫我和刘才去西佳木斯郊外日寇监狱处理死难同志善后事宜。当我再一次走进这万恶的牢门时，心都发颤了，泪水不自觉地往下流，见到西北墙角处挖有一个大坑，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几具被砍掉了头的尸体，再一迈进监房走廊上又发现有三具白俄人尸体（据说是做饭的）我们顾不得满道上爬来爬去的足有手指粗的蛆，也顾不得那令人窒息的血腥臭气，走遍各个监舍。我看到有三十多具尸体，有爬到门口死去的，有在走廊和监房死去的、有握拳的，有捶胸的，呲牙怒目的，惨状不忍卒睹。其中我认识的虽然不多，但在思想上总觉得那些蒙难者，都是我们的同胞骨肉，都是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勇士，都是有骨气的炎黄子孙。虽然他们的面部身体发肿变形，肉体发臭，但见了他们还觉得十分可亲，久久不愿离去。突然在一个监房的墙壁上发现有血书，用血写着“共产党万岁”“还我山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个监房的墙壁上写着：“祖国万岁！”“国民党万岁！”等标语口号。可是在标语下面躺着的这具尸体却难以辨认了。忽然在我身后一个女人号啕大哭起来，原来她就是地下这位死者李谏非的妻子。她是从丈夫脚上，

穿的那双她亲手补过的袜上认出了亲人。谏非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难友。禁不住我们都哭了，经过我们大家的搀扶和劝说才把烈士的家属劝了出来。走到马路上又发现一具尸体，仔细一看他也是我的同学赵连青，他是被枪击后因失血过多，虽挣扎到路边但也没有得救而牺牲的。可怜他新婚的妻子已有身孕。我们将这些爱国志士的遗体都一一埋葬了。

在八月二十日由李广德主持开了追悼会，幸存的只有张玉书（张人天）、李广德和我三个人。追悼会是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鼓乐声中开始的，在一片抽泣中，我们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夺走了我大好河山，使我东北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长达十四年之久。来自各界的人士和参加会的群众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血债要用血来还。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四十年过去了，对这血泪斑斑的事实，我还记忆犹新。

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礼炮声中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夺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现在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为完成“四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艰苦奋斗。个人虽然年事已高，但却壮心不已，愿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为祖国的兴旺发达献出自己的余生。

血染泥鳅河

石丕城　　周　人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本宣战。九日，苏联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九日，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迫使日本天皇裕仁不得不于八月十五日接受《波茨坦公告》颁发了无条件投降诏书。但是在此之前日本军国主义者不甘心失败，还要做垂死挣扎。侵占我满蒙地方的日本关东军，纠集其余部，胁迫伪满洲国的满蒙伪军，妄图于吉林至通化一线，黑龙江的林口至牡丹江、绥芬河一线，阻击苏联红军解放东北。其驻北满部队于八月九日开始向林口、麻山一带未完成的战备工事集结。而密山、虎林、饶河、宝清则是从八月十三日向林口撤退和集结的。但是，这些都是无济于事。苏联红军的神速行动，使得日伪军措手莫及。苏联空军已于八月九日开始对日伪军事设施，进行了轰炸，八月十五日，苏联大军，兵分数路，长驱直入，几乎占领了东北全境。日寇的妄图阻击，拖延战时，掩护撤退的梦想，彻底破产了。

虽然已到此时，而骑在宝清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十四年的一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仍然不肯放下屠刀，在仓惶逃命途中，于宝清县和勃利县交界处的泥鳅河，制造了一起震惊全东北，触目惊心的集体屠杀反正国兵的大惨案。

一、丧家犬竞相奔命，挟走狗以安贼心

八月五日，上午九时之后。一架苏联侦察机，飞临宝清上空。作了暂短飞行侦察以后，便向虎林、饶河方向飞去。十一时左右，又有两架战斗轰炸机，飞临宝清上空。一架直奔小西山变电所，投弹两枚，炸毁了变电装置。另一架飞抵万金山伪军二十八团大营，盘旋扫射多次，随后向虎林、饶河方向飞去。

苏军轰炸后，宝清开始混乱。老百姓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奔走相告，一直盼望的解放，就要来临了。日伪统治者，则惊魂落魄，昼夜不安，开始策划逃命，

日本关东军驻宝清县境的三九三、八〇七和五〇二部队共计二百多人（原二千五百多人，除被抽调去参加太平洋战争，只剩二百多名老弱残兵留守）及驻宝清日本宪兵队几十人，已于八月九日晚，偷偷撤离宝清。十一日，日本警察、官吏家属开始撤离。伪第十一军管区，命令所属伪军开赴林口、麻山，阻击苏联红军。宝清县内的伪第二十八团所属各营、连的留守人员计七百余人（二十八团另一千余人，早已由团长刘国范率领在麻山修战备工事），在副团长刘长顺率领下打着二十八团军旗，取道勃利，向林口方向进发。第十一辎重队驻宝清的辎重三连，共一百二十人，连同辎重车辆，在少校连长张东书的率领下，也向勃利方向撤去。八月二十日，日本在宝清机构，包括各种株式会社、工商界、移民开拓团陆续撤往勃利。一时闹得宝清至勃利间的崎岖、蜿蜒，只有土段的三百多华里长的荒僻公路满是军队、辎重、车辆、日本民团、日本官吏、警察、家属……迤

逦而行。那几天，又正赶上阴雨绵绵，道路泥泞不堪。汽车走不了，就掀在路边，倒上汽油烧；东西拿不动了，扔；道路不好走，用被服垫；桥坏了，用大车棚子搪上；洼子过不去用大车、车轴、枪支垫。日本妇女鞋坏了，穿丫巴袜子走；袜子坏了，光脚板。没有吃的，就到附近田里挖土豆、掰生包米啃。个个竟相奔命，犹如丧家之犬。真是狼狈至极。

入日本籍的朝鲜族警察官们，一看到这种情形，也心惊胆战赶紧抓车、拉夫运送其家属撤退。伪警察执行警尉吴升默（日本名古川博清）回忆当时情形，不满地讲"日本人说的倒挺好,日本族、朝鲜族都一样,都是日本人吗！什么他妈的一样？他们的家属先搁汽车送走了，我们的不管啦！"。

统治、压榨宝清县人民达十四年之久的一小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以伪宝清县参事官（副县长）笠原英杰，警务科长安田正太郎（警正，老百姓送外号叫："大叫驴"），警务科指导官佐佐木（警正）。特务股长木村勇（警佐），特高警察森泽建二（警佐），兵事系主任堤卯吉（警佐）等人为首的日本警察、官吏眼看大势不好，灭亡即临，真是心惊肉跳。为了安定情绪,拖延灭亡时间，他们曾多次密谋策划，并纠集警务股长佐藤（警佐），经理系主任及川（警佐），庶务系主任田中熊夫（监督警尉），人事系主任长赖（监督警尉），警务警察枫原（监督警尉），保安股经济系主任井上力（监督警尉），保安系主任厚藤（执行警尉），警防股长松尾（警佐），警防系主任通口良一（监督警尉），特务系主任芦田（监督警尉），内勤警察大山（警佐），内勤警察几良（执行警尉），直辖派出所长坂田（警佐），原特务股

长杜布（警佐），警察松村（监督警尉）及日本籍朝鲜族警察庶务系通译小岛兴光（警长，朝鲜名张兴光），警务光山卓雄（执行警尉，朝鲜姓名不详），收发古川博清（执行警尉，朝鲜名吴升默）保安金教升（警长，日名不详）防空系主任温泽（警乘，朝鲜姓名不详），通讯系主任文泽盛光（警尉，朝鲜姓名不详），外勤朴容灿（监督警尉，日本名不详），乘警松本河锡（警长，朝鲜名崔河锡），青山派出所长张本（监督警尉，原姓张，朝鲜名不详），七星河派出所松原（警长，朝鲜姓名不详），警务科山本（监督警尉，朝鲜姓名不详），警务金本昌顺（警长，原朝鲜姓金，名不详）等七十余名日本官吏、警察和移民开拓团部分成员。他们以保护县长安全撤退为名，挟持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培养起来的并为之效忠多年的汉奸走狗、伪宝清县长佟松寿及其老婆、女儿，于八月十三日，烧掉了全部敌伪文件、档案，临时抓了几辆马车，最后一批撤离了宝清，向勃利方面匆匆逃去。

二、遇退兵六神无主，动杀机为绝后患

这帮日本法西斯匪徒，在撤往勃利县途中，笠原英杰和"大叫驴"安田正太郎等人，先后曾多次聚会，研究撤退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其对策。并指派小岛兴光为首领、古川博清为翻译、松本河锡、朴容灿、松原等五人为保卫小组，专事保护县长佟松寿。并指示说："没有命令昼夜不得离开县长，有事时由翻译进行传达转告。"

这帮法西斯匪徒，非常奸诈、狡猾。为了以防万一，每人佩备"康八式"步枪一支，其中大部分佩有短枪，一部分佩有战刀。全队共配备轻机枪两挺。携有大批粮食、弹药。每

日行军时，都派有二、三人先头小队，执行尖兵与斥候任务。每当休息和宿营时，也由警察们轮流充当警戒哨。

由于八月十三日晚开始，接连下雨，道湿路滑，步行困难，大车行进更为艰难。只好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地向前蠕动。就这样，这帮匪徒怀着一颗惊恐不安的心，拖着两条疲惫不堪的腿，于八月十六日中午才爬到了大泥鳅河东岸。

由于连日阴雨，山水不断下泻，造成各山洞大小河流水位不断急剧上涨。大泥鳅河，窄窄的河道早已出潮，河水漫过草甸子向下游涌去。宝勃公路，从东北蜿蜒伸向西南，至泥鳅河东岸的北岗脚下，便折向正西方向，横穿泥鳅河，延伸至勃利境内。由几根木桩和横梁架在泥鳅河上的桥。几天来由撤退军队、逃跑日本人，临时垫补总算勉强能通过行人，马车。撤往勃利去的二十八团和十一辎重队三连，他们早于两天前通过这里。此时已很少有人路过此地了。

八月十五日上午。二十八团团部连同军旗，在桃山附近，遭到了苏联空军轰炸。结果团旗炸飞了。掌旗官和日本教官横尾少佐、岸本上尉当场炸死了，士兵们逃散了。

第十一军管区司令部所属十一辎重队三连，在张连长的率领下，没等到达桃山就遇见了二十八团退缩回来的官兵。连长张东书，听说二十八团被炸，苏军已进林口、勃利等地的消息，当即停止前进。于是便召集官兵训话，决定就地解散，自讨方便。当时有三十来人跟少士李班长去勃利。这些人大部分是家住在南部或西部县份，有的是吉林、榆树的。另七十多人跟连长、教官返回宝清。张连长率部于八月十六日中午，返至泥鳅河西岸的山岗脚下，已走得人困马乏，便在路边休息下来。士兵们将马拴在离公路一里半远的林子里

乘凉，人们分散在路边或林荫下休息、造饭、吃东西。

驻在泥鳅河东岸的笠原和安田这帮匪徒，得知二十八团于桃山被炸溃散，苏军已进军密山林口消息。又看到辎重三连从前方退了下来，心情更加惴惴不安。面对这一队全副武装退下来的满洲军，他们更是胆战心惊，六神无主。"他们要干什么呢？临阵逃跑？倒戈？"于是，安田等一伙匪徒几个主要头头便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应付眼前瞬息万变局面的对策。

三、花言巧语施鬼计，穷凶恶极亮屠刀

八月十六日下午一时左右。笠原参事官和安田警务科长，通过佟松寿县长，命令小岛兴光去召辎重三连长来报告前方军情。张东书得知佟县长一行在河东，便带两名见习教官随小岛来见县长。当张连长三人来到桥东之后，立即被日本警察们暗暗围住。参事官和县长简单地打听了一下前方情况，便叫张连长集合队伍，说县长要训话。于是张连长命令教官去集合队伍。辎重三连七十多人，除留两名士兵看马之外，全部由教官率至桥东公路上。然后命令架枪，后退五步，到北侧路边就地休息，听候县长训话。当三连全体士兵刚刚把枪放下，退到路边时，日本警察们便迅速地把枪一撮撮抱了过去。这时，两挺轻机枪架在对面路旁。七十多名日本警察、朝鲜警察、日本官吏、日本开拓团员全部弹上膛、刀出鞘，一齐对准这七十余名辎重连官兵。就在这同时，以小岛为首的九名警察，分别在桥西五百米地段内放上三道卡子。第一道四名，第二道三名，第三道两名，拦截从桃山方面溃退回来的散兵。

这时从西岗上下来三三 五五的一 会儿一帮， 一会儿一帮，奔向泥鳅河桥。其中有带枪的，有没枪的；有穿军装的，有已换上便衣的；有骑马的，也有步行的。当他们进入第一道卡子时便被解除了武装；第二道卡子搜腰；第三道卡子脱衣服；然后赶至桥东。二十八团的教官于长跃等九人，三机连的冯吉武等五人，迫击炮连的周泽臣等四人，通讯队的张广荣等六人，都是这样被截去的。当时张广荣等人已换上便衣，杂在劳工群中，但是，也被小岛、松本等赶了过去。就这样，前后不到两小时，又拦截十多伙，一百余人。前后共一百八十余人。

桥东头，笠原参事官，穷凶恶极地对着放下武器的国兵们嚎叫着："步兵操典上明文规定：非常时刻（战时）携械逃亡，就地正法"。这，你们是知道的。今天本来可以就地枪毙你们，念你们家中都有妻儿老母，可以放你们回家。但是可有一件，枪，是国家的；军服是国家的。请你们再把军衣全部脱下交上来，就可以放你们走"。随即强令伪国兵一个个脱下军衣。

四、枪刀齐舞尸两岸，泥鳅河水血染红

原二十八团迫击炮连周泽臣，他是第三帮被鬼子拦截赶来桥东的。他回忆当时情形 说："当我来 到桥东 时一看，啊！足足有一百五、六十人，都光着膀子一溜四排跪（日本式坐着）在公路北侧路边，两挺机枪支在路南沟帮。六、七十名鬼子都端着枪冲着大伙。我马上感到情况不妙。心想：这不是要枪毙我们吗？这时一个鬼子叫我快跪到前面。我跟跪在身边的一个会说日本话的国兵说：'你倒说说呀！'他

不敢吱声。我就左右传话说：‘咱 们就这样 眼睁睁 地等死吗？一个传一个，大伙一齐上和鬼子拼吧！ ’。这时一个鬼子看见我乱活动，上来一把揪住我的衣领，用力一推，把我推倒人群中间。我看看谁也不动。我就趁势窜到最后排的壕沟边蹲下。我心想：‘你们不干，我可得跑 ’。就在这时，笠原对准张连长就是“砰”的一枪。安 田挥舞 着战 刀壕叫着：しやげき（射击）！随之，机枪、步枪、手枪齐发。枪声象爆豆般响彻泥鳅河两岸山谷。一百八十多名国兵倒在路边、路沟、河里、甸子里。枪声伴随着鬼子壕叫声、国兵的呼叫声、喊声、叫骂声、呻吟声持续了二十多分钟。”据另一名幸存者冯吉武回忆当时情形时讲：“一个大个子的国兵，已经跑出路北十五、六米远地方，背后有个鸡蛋大小窟窿，站在那里，指着这帮鬼子高声骂道：‘你们这帮侵略成性，杀人不眨眼的东西，连国兵你们也不放过。你们完蛋啦！不得好死的。 ’这时我趴在他附近水沟子里，怕他暴露目标，喊他快趴下。就听他说：‘我左 右也不 能好啦 ’，话 音刚落，一排子弹打过来，他晃晃荡荡地倒下去了。”

当鬼子开枪时有十多人滚下水沟，有的跑进河里；有的窜进草甸子里。但是不管你跑到那里，鬼子的子弹就追你到那里。你窜进河里，一排排子弹就打到水里，溅起一串串水花；你跑到草荡里，一排排子弹就打到草里，洋草刷刷掐断半截；你跑到山坡上，一排排子弹就打到山坡上，树叶纷纷落下。顿时间，桥东北侧路面上，横七竖八，遍布尸体；路沟飘浮着尸体；河里流着尸体；草荡里躺着尸体。河水变红了，路沟水变红了。干净的泥鳅河，流的不是水，而是血，血！血伴随着暴涨的河水，缓缓地向下游流去，流去……。

太阳偏西了，枪声逐渐停了下来。这帮杀人恶魔，放起了一把火，烧掉军衣、被服、纸币，砸坏了缴下来的枪托，丢掉了枪拴，慌慌张张过桥向西逃命。

杀人余兴未尽的这帮恶鬼，刚逃到西岗脚下，又遇见了从北兴过来的十三名国兵，当即又被他们杀死于路南道沟。其中一名趁鬼子未来得及开枪，一步跃过同伴尸体，向南边跑出五步，便被鬼子从背后一刀刺于地下。同时也身中数弹，四肢拉叉死去了。赶到这群恶狼逃至西大岗时，又遇上二十八团中士兵赵春芳等三人。赵当时手拎把刀锯，鬼子不由分说，将三人刺死于岗上（据七星泡任德本讲：死后五、六天，刀锯仍在身边）。就这样，这帮亡命之徒，前后不到三个小时工夫，连续三次屠杀我中国年轻男儿即达二百余人。

五、呼儿哭夫声声泪，血海深仇谕后人

惨案噩耗传出之后，人人无不深恶痛绝。特别是当时家有强征当兵在外暂时未归者，合家老小真是个个提心吊胆，忧心忡忡。深恐自己亲人遭受不幸。那时候，有多少老母倚门望儿归；多少妻子扶栏盼夫还；多少父兄到处问讯；多少亲朋四下寻访……悲痛之状，不忍闻睹。

这场惨案，给二百个无辜家庭带来了空前灾难。赵春芳家，听说赵惨死在泥鳅河，家里人不敢相信。母亲成天站在门前张望，父亲到处打听消息。直到同村任德本回来，告诉赵家说，他们原先是一起逃回来的，赵已换了便衣，拣把刀锯拎在手中，以备防身。到桃山时，任怕途中危险，住下了，而赵坚持非走不可，因此分手。待三天后当任走到大泥鳅河西岗上，看见路旁有三具尸体。面目发胀已看不清了，其中一

具身旁有一把刀锯，衣着也象赵，证明赵被害无疑。这时赵家才相信春芳已死。其母其妻哭的死去活来，全家老小整日泡在泪水之中，其妻在公婆的劝说下，于第二年春，带着二岁女孩，改嫁到集贤县风林屯朱家。遇害者宝清镇刘庆丰，家中只有六十多岁老爹和二十二岁媳妇过日子。媳妇在第二年改嫁了。老爹活活熬糟死了，刘家从此断根了。遇害者方盛村高畔富，其守寡多年的老母和妻子听说高死在泥鳅河，当时婆媳二人就哭的晕了过去，老母整日哭着闹着要去泥鳅河找儿子。后来去了，早已血肉无存，只见一堆堆白骨。媳妇第二年改嫁。寡母成年累 月啼哭，竟哭 瞎了双眼。 高的老母，现还健在，已经八十七岁了。每当提及此事，总是泣不成声，她痛恨杀人不睁眼的日本强盗，告嘱后人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深仇大恨。

日本军国主义者据我河山，掠我资源，杀我同胞，奸我妇女。使我华夏大地，生灵涂炭，给我中华带来空前绝后灾难。当其日暮途穷，步向审判台的时候，还在龇咀獠牙，挥舞屠刀，制造了一起起触目惊心大惨案。宝清县泥鳅河事件，就是千百万个惨案之一。

附记：本材料，承蒙下列人员提供。谨致谢意！

泥鳅河事件幸存者：

冯吉武：原伪二十八团二营三连勤务兵，现宝清县粮食局退休干部，现住宝清镇。

于长跃：原伪二十八团军官候补教官，现宝清县夹信子乡农民，现住宝清县夹信子乡三道河村。

孙忠仁：原伪二十八团三机连士兵，现宝清县青原乡农民，现住宝清县青原乡西六村。

周泽臣：原伪二十八团迫击炮连士兵，现吉林省舒兰县农业系统退休干部，现住吉林省舒兰县小城良种场。

王侦祥：原伪二十八团士兵，现宝清县夹信子乡农民，现住宝清县夹信子乡徐马架子村。

泥鳅河事件路过目击者：

高化夫：原伪十一辎重队驻宝三连少士勤文书，现宝清县农机站退休干部，现住宝清镇。

李世才：原伪东安警察学校学生，现宝清三 中离 休干部，现住宝清镇。

那成伍：原伪被抓劳工大车老板，现宝清县夹信子乡农民，现住宝清县夹信子乡徐马架子村。

高忠礼：原伪二十八团士兵，现宝清搬运队退休工人，现住宝清镇。

石丕城：原伪第十一通信队电报兵，现宝清三中离休干部，现住宝清镇。

胁从参予者吴升默（鲜族）日本名古川博清：

吴升默：原伪宝清县警务科收发，执行警尉，现黑龙江省密山县朝鲜中学退休教师，现住密山镇铁路北。

最后的战斗

——抗联英雄赵尚志遇难的经过

陶建明

一九四二年元旦期间，敌人获悉赵尚志在汤原、萝北一带活动，就收买了伪金矿局梧桐河矿警队警士刘德山，以进山打猎为名，寻找赵尚志的踪迹，准备进行暗杀活动。

二月中旬的一天，在鹤岗附近的林区，刘德山与正在搜集敌情的赵尚志等人相遇。赵尚志命令缴了刘的枪支。但恰巧跟随赵尚志的姜立新参谋长曾和刘相识，便错误地从中做了介绍。因此，赵尚志没有处决刘，而对他进行了抗日教育。刘德山伪装积极，骗取了赵的信任，并向赵献计说："梧桐河警察分所有十几条枪，晚上只设一个岗哨，敲一下垂手可得。"赵尚志见他说得诚恳，便信以为真，并决定突袭梧桐河警察分所。次日，赵尚志又收留了来为刘德山送饭的敌伪人员张某。组成了包括刘、张二人在内的六人突袭小分队。

腊月二十八日的夜里，赵尚志率队冒着严寒和小青雪，奔向梧桐河警察所。走到吕家菜园子附近时，已近午夜。刘德山建议说："这里离警察所没有多远了，天还早，不妨先进菜园子暖暖脚。"赵表示同意，便改道向菜园子方向走去。在离菜园约还有三十米远时，刘德山借故留后几步，随即端枪向赵尚志射击，子弹从腰部射入，从左前腹部穿出，伤口有小碗口大，赵尚志当即扑倒在地。此时刘德山又打响第二枪，将走在前面的王永孝打倒。正当刘德山欲调头逃跑

时，赵尚志忍痛向他射出愤怒的一枪，将刘匪当场击毙，这个走狗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在后面断后的姜参谋长闻声赶到，将赵尚志抬入吕家菜园，而张某却趁机逃走，去伪警察所报信。

吕家的吕仙龄老大爷等五人起初很害怕，赵尚志和蔼地说："我们是抗联的，你们不要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并招呼说："大娘，你给我暖暖手吧。"空气缓和下来。姜参谋长说："趁敌人还没有来，我们抬着你快走。"赵尚志说："不行，走不出去了，你们快走。"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包东西，交给姜参谋长："这是部队的生命，一定要带好。"姜参谋长流着泪说："我们一定要抬着你走！"赵尚志严肃地说："这是命令，你们赶快行动！"姜参谋长强忍悲痛地说："我们一定来接你。"便带着仅剩下的一名战士走了。

不一会儿，敌人赶来了，把昏迷中的赵尚志和王永孝用爬犁拉到了警察分所。赵尚志的伤口仍在流血，但他拒绝敌人为他治疗。鹤岗伪警察署连夜派人乘车赶到梧桐河警察分所，并把叛徒李华堂等二人叫来认人。他们见赵尚志伤势严重，就地进行了突审，警察分所所长见赵尚志坚贞不屈，气急败坏地说："你已经落到我手里，你要放明白点。"赵尚志怒斥道："我赵尚志虽死无憾，只是国仇未报，死难瞑目。我倒要警告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放明白点，你身为中国人，却甘当日本人的走狗，能对得起你这身中国人的人皮吗？"气得那个汉奸张口结舌。

次日（一九四二年旧历腊月二十九日）七时许，赵尚志终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壮烈牺牲。

抗日战争时期我的一家

刘淑珍

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土地上，大肆烧杀掠夺，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反抗。千千万万个热爱祖国的英雄儿女，纷纷走上抗日战场。在敌强我弱、处境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她）们坚贞不屈、前仆后继、历经千难万险、克服重重困难、以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坚持与日寇斗争。终于赢得了一九四五年的“九·三”抗战的胜利，迎来了社会主义祖国的今天。

我要讲的是在那血和火的年代里，我和我的一家，和其他热爱祖国的人们一样，不怕洒热血、抛头颅和敌人周旋。先后有七位亲人惨遭日寇杀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笔血债，永远不会忘记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深仇大恨。

我于一九二三年，出生在依兰县德裕镇舒乐村北白家屯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三岁时，就失去了积劳成疾的母亲。从此，便在跑腿窝棚里跟着父亲刘武、伯父刘文、叔父刘双和刘宝还有哥哥刘殿奎一起，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的贫苦生活。一九三一年，由于生活无法维持，不得不跟着父亲、大伯、叔父们，把家搬到松花江南阿木达屯（涌泉乡居住）。这年，正逢“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了松花江两岸，第二年就遍及了依兰城乡。不愿做奴隶的依兰城乡人民，纷纷拿起武器，奔赴抗日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斗争。我的家乡阿木达

屯，位于依兰县东部山区。在那里，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和抗日军队活动频繁。一九三四年那里就成了抗日的红地盘，遍地都成立了抗日救国组织。三军、六军的一部分队伍，经常在那一带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我的家，成了抗日的堡垒户。一家老少积极支持抗日，三军的一个队付张喜山常常住在我家，后来（一九三五年春）我的哥哥刘殿奎跟着他上了山，参加了抗联三军当了战士。我这样一个抗日的家庭，惹起了敌人的注意，警察、特务和日本守备队的人，三天两头就来阿木达屯找我父亲，说他儿子“马胡子”（抗日军），家里还经常窝藏土匪，吓得全家东躲西藏。我家人觉得这样的躲藏也不是个长久的办法，于是在三五年冬，又搬回了江北白家屯。一九三六年春，我的父亲认为我十四岁也不算小了，不能再在这个跑腿窝棚呆下去，让我去参加抗日队伍，为国为民出把子力。我虽然只有十四岁，但在阿木达屯时就懂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所以，我父亲一提出让我去四块石山里参加抗日军时，我就高兴地答应了。我父亲把我从白家屯领到迎兰乡北边小营盘一带的石头庙子。捎信给三军司令部说明此事。那时我哥哥就在三军司令部。司令部派了常去我家的那位张喜山队付下山来，把我接上去。临别时，父亲亲切地嘱咐我：“孩子！虽然你只有十四岁，但在咱这穷人家，你已经不算小了，到了部队要好好干，你应该懂，没有国就没有家，尤其是我们这些穷人。到队伍上不要挂记家，要跟着队伍抗日到底。”然后又对张喜山说：“这孩子还小，不懂啥事，今后要靠你们多分心了。”说完我父亲就回了白家屯，谁知道，这竟是我们父女最后的离别呀！我跟着张喜山进山以后，把我留到了三军稽察处。三军稽察处

二百多人，是保卫三军司令部的，住在山边的沟里，离司令部有二十几里路。三军赵尚志军长、冯仲云主任都曾住过这里。三军稽察处当时的领导是葛文奎副官、高平一副官，还有个田队长、吴主任。我在稽察处当战士，有时给司令部送信，站岗放哨，有时缺吃的就去挖野菜，扒树皮；有时为执行任务的同志送饭、送子弹；也有时侍候病员，总之，是那用那到。一九三六年的七、八月份，张寿篯（李兆麟）同志去山里四块石三军司令部，路过稽察处营地，正赶上他的爱人要小产。葛副官找到我，对我说："小刘，有一位女同志要流产，住在咱们这里，要你去照顾她几天，她好了就去司令部。"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女同志是谁？后来才知道，她是抗日十大联军的领导张寿篯同志的爱人，大家都称她是"女张"。我见到女张时，正赶上张寿篯同志也在跟前，他一见我就问我，叫什么名字。因为我没有名字我红着脸、低着头、好久答不出来，我说："我叫小刘，没有大名。"旧社会的女人，受封建礼教束缚，那有什么名字，尤其是穷人家的女孩，根本就不起名，起个小名，一直叫到出嫁。张寿篯同志看我的样子很可笑，就风趣的说："我给你起个名字好不好啊！"我高兴的说："好啊！"于是他向四外瞅了瞅，然后想了想说："你看这四面的青山里，到处都是大树，抗日军又是挽救祖国的珍贵财富，我看你就叫刘树珍吧。"我当时高兴的了不得，从此，我才有了自己的名字。

这年的秋末冬初，由于抗日军吃粮紧张，司令部派我哥哥刘殿奎下山去白家屯，找我父亲搞点粮食。我哥哥半夜回到家，找了邻居白老六和我们全家人一起研究，如何弄点粮食送上去。白老六对我哥哥说："粮食的事你就放心吧，不

过，你得连夜离开这里。这几天风声挺紧，鬼子的探子（特务）经常来屯子里转游，遇上他们就糟了。”不料，我家的一个邻居家，就住着一个叫蔡嗑巴的特务。我家和他家只有一墙之隔，我哥哥他们说的话，研究的事，竟被蔡嗑巴听的一清二楚。于是这个狗汉奸，连夜奔向舒乐镇，报告了日本守备队。天刚拂晓，这边我哥哥刘殿奎研究完了送粮的事后，正缠着绑腿要走，我的叔父气喘嘘嘘的从外边跑进来说："不好，日本人的马队上来了！快跑！"我哥哥出门一看，敌人已经上来了，跑！已经来不及了。随后，日本兵端着枪，就闯进了我的家门，把他们都堵到屋里，对他们说，你们通通是"马胡子"。于是，就把我的哥哥刘殿奎、父亲刘武、伯父刘文、叔父刘宝，还有白老六，全都绑上，押到舒乐镇的日本守备队里。在守备队一连审讯了五、六天，让他们说出抗日军的地点、人数，他们五个人什么也不说，只是说，我们都是良民，不知道抗日军的事，日本人见他们什么也不说，就给他们上老虎凳、灌辣椒水，还用开水烫他们的脑袋，有的腿被打断了，有的头皮和头发被烫掉了，就这样，他们五个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始终不吐一字真情。日本人一看，从他们嘴里是什么情报也得不到，就把他们五个人装进了麻袋扎上麻袋嘴，一个一个扔到松花江里淹死了。日寇残害了我的父兄叔叔大伯四位亲人和白老六以后，第二天又重来白家屯，一把火，烧了整个村庄。日伪军一边放火，一边大喊大叫，要杀尽白家屯里姓刘的人。我的另一个叔父刘双，在乡亲的掩护下，改成了姓白的，才免落虎口。全屯十八、九户人家的房屋、仓房、牛马棚、猪禽舍等建筑和衣物财产，全部化成灰尽。幸存下来的一百多口人，也都流离失所，无

家可归，扶老携幼的四处逃散了。这就是松花江西岸，远近皆知的火烧白家屯事件。

我在山里知道我的几位亲人被日寇残杀和火烧白家屯的消息后，心里真是万分悲痛，恨不得跑下山去和日本人拚个死活。但是，我把这种悲痛化为力量，把家仇国恨，牢牢的记在心里，下定决心跟着部队为父兄亲人、为遭到日寇残害的爱国志士报仇，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父亲送我上山时嘱咐我的话，时时刻刻的都在鼓励着我，不论发生任何情况，我都要毫不动摇的抗日到底。我在部队的日子里，跟着队伍转战四块石山上山下，山里 山外，吃 尽了 千辛万苦，经历了千难万险，我都毫不退缩。

日寇火烧白家屯以后，更加疯狂 了。讨伐、 搜山更 勤了。三天两头的就进山寻找和追捕我们抗日队伍。这时我已由三军稽察处调到三军被服厂。我们三军被服厂只有三台缝纫机，五个女同志做活，两个姓金的，一个姓李，大金叫金伯文，小金叫金玉善，姓李的我们叫他小李。这三个人都是从三军司令部调来的。我和小葛（葛文奎的大女儿）都是从三军稽察处调去的，我们五个人就负责裁剪、缝制军服、军帽、子弹袋和缝补旧衣服、煮染白布等活，还有一个男同志姓车，因他智多识广有谋略，大家都叫他“车军师”。他负责被服厂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另外，还有三十多名战士，负责被服厂的保卫工作。开始，被服厂就在四块石山东北的一个山沟密林里。后来，由于日本人常来搜山讨伐、追剿。被服厂的人，不得不背着缝纫机满山转游，走走打打，走到哪，就在哪就地砍倒几棵树，就地挖个坑，搭个棚子，作为临时的被服厂。遇到敌人就边打边走。我们作军衣用的布，都是

山外群众用小背，背上来的白布，用山上的桑条等草木当染料、放到锅里煮成灰不灰，绿不绿的颜色。那时我们在山里吃的和用的东西，都是靠山外的群众背小背来供应。在山下为抗日队伍操办这类事情的人，都是那些在屯里有一定威信的人。他们既支持抗日，又和"官相"有来往；城乡内外，公私两相他们都有人，都能办事。像舒乐镇的刘八爷，就是这样一个人。每次背小背，都是他出头组织，一组织就是七、八十人，把抗日军所需要的物资送到指定地点，然后再由部队的同志，从山上来到指定地点，把物资背到山里去。但是，到一九三七年秋后，形势更加紧张了，日寇对山里山外进行严密封锁。一旦抓住背小背的群众不是抓去蹲监狱，就是就地打死。或者抓回去，经过审讯后，再装到麻袋里扔到松花江里淹死。舒乐镇张喜珠的哥哥，就是给抗日军背小背，被日本人抓去，扔到松花江里淹死的。从那以后，山外的群众，就很少进山了。自然抗日军的处境就更困难了。到三七年末，这个被服厂就解散了。大金、小金和小李回到司令部去，我和小葛又回到稽察处。我回去不久，经葛文奎副官介绍，我和战士关发结了婚，婚后不几天，我丈夫关发，就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家庭，又被鬼子给毁灭了。这对我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是，我没屈服。新仇旧恨使我更坚强了。一九三八年春，大部队向苏联转移，只留下一小部份在山里坚持活动，我和其他一百五十多名同志留下来，我们的领导还是葛文奎副官，还有一个周队长一个吴主任。由于日本鬼子不断讨伐、追剿。我们不得不继续向深山里转移。每天都有战死的，或者掉队后被日本讨伐队活抓去的。一天夜里，讨伐队追了上来，我们拼死的搏斗，

总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但是葛文奎的两个儿子和几名战士牺牲了。还有四、五个人当了日本人的俘虏。有一些人看到这种形势情绪有些低沉。当时的情况是：无吃少穿，子弹不足，敌人讨伐频繁。几个领导人，根据上述形势进行了研究决定化整为零，分散行动。让我们有亲的投亲、有友的奔友，暂时隐蔽起来，等待时机。不管形势怎样恶劣，只要不投降、不叛变，不当汉奸走狗就行。周队长、吴主任，还有一些人都走了。我想我的亲人都被日本杀害了，既没亲可投，也没友可奔。抗日队伍就是我的家。于是，我又和葛副官等四十多人留在北山里，和日本人周旋了一年多。葛副官几次派人下山弄粮食，都是一去不复返。不是被敌人抓去，就是中途牺牲了。一九四〇年农历四月间，葛文奎副官，又派了我和我的公、婆三个人下山，到依兰城里买粮买鞋。这二老一少，敌人不太注意，我们走了两天，顺利地走到了依兰江北迎兰镇。迎兰镇有警察分署，有自卫团，我们不敢进。就绕道西行，到了小庙街的江边老于家，也叫点灯房子（点航标灯人住的房子）。老于家的户主叫于占海他家有妻子和一个十三岁的儿子，他也是抗日的支持者。当我们把情况说明后，他们一家人都表示愿意帮我们的忙。于是我和我的公、婆三人就住在他的家里。白天过江到依兰城里买粮食。我们三口和于家三口每天过一趟江，买够我们背的就回来，一连跑了五、六天，买了五百多斤小米，雇了迎兰镇的王喜山、赵文奎、曹太来三个人一台车，把粮食送到了烟筒山，交给了葛副官。买完了粮食，我们还要买鞋。粮食送走后的第二天，我们六个人，又过江去城里买鞋，谁想到，这次买鞋竟是我最后的一次抗日活动。

农历四月，正是开春江冰解冻季节，冰层上已经淌着沿流水。头几天，我们来回走就十分小心。可是这次，当我走到江心，一块冰层踩漏了，把我掉了进去。我的公、婆看我掉进江里，急忙赶来救我，一下子也掉进江里，这时于占海夫妇和他的儿子，也过来救我们三个人，结果六个人都掉进江里，眼看已经都没有救了。这时过来一个姓赵的打柴人，他用木杆子把我和于占海夫妇救了上来，我的公、婆和于占海的儿子却被江水吞没了。

过横江，一下子淹死三个人，这消息很快的轰动了迎兰镇，警察和自卫团的人，也都闻讯赶到点灯房子老于家。于占海老婆，在哭诉儿子时，忘了情，暴露了我的身份。警察乘机追问我的来历，并索取我的良民证。我没有良民证，就被警察带到警察署，审问我是什么人，干什么来了。一边审问，一边威吓我，说你小小的年纪，就当“抗联”，反满抗日，胆子真不小，你不讲出抗日军的地址，就打死你。我没怕他们的威吓。我说，你们说我是“抗联”，我就是“抗联”，不过抗日军住在那我不知道，其它什么我也不讲。一连半个多月。那些警察也没审出个什么结果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又没有什么真凭实据，警察也奈何我不得，只好把我押在监狱里，隔几天过一次堂。最后由迎兰镇一个和“抗联”有关系的于老六，托人、花钱，把我从迎兰镇监狱里营救出来。

于老六叫于占祥，他过去和“抗联”常来常往，听说我是“抗联”的，他就找了迎兰镇有名望的人钱甲长钱子厚，横江摆渡的陈舵工，他们三个人出头，花一些钱保释我“听审不误”。我出狱后又在于家住了半个多月，在这个半

月里，我通过于占祥向山里联系过好几次，但都没有得到回信。不几天又被竹帘警察署把我传了去，三天一过堂，两天一审讯，每次都要遭到一次毒打，但是敌人始终没从我嘴里得到什么东西。在这二十几天里，迎兰镇的于占祥、钱甲长、陈舵工他们又来到竹帘警察署，花了一些大烟土，把我保了出来。其条件还是“听审不误”。此后每年还要向当地警察署交几张照片。出门办事、接触外人都要受到警察的监视。就这样，我在敌人的监视下，过着所谓的自由生活。暗暗的等待抗日军的消息，盼望着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把感情深深地埋在我的心底。直到一九四五年祖国解放，我才获得了真正自由，过上了心情舒畅的幸福生活。

高俊峰　整理

夜袭肇兴镇，激战上街基

王海珍、乔占江

肇兴镇地方并不大，但日伪军警机关林立，如伪县公署、伪军二十团、日本军南大营、伪警察署以及日伪特务组织都在严密地注视着抗日联军活动，妄图消灭抗日联军和割断抗日联军同苏联的联系。基此，日军分别在肇兴、名山、延兴、兴东……沿江各地设立据点，扼守要津。

一九三八年初，北满省委在依兰县东二区杨树林（又称“杨树沟”），召开会议。抗联三军军长赵尚志、六军政委李兆麟、三军九师师长李振远等六人均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三军、六军进行联合行动，冲破敌人封锁，拔掉敌人据点，打通与苏联方面的联系。具体的安排是：一、由三军九师师长李振远等六人在萝北县三间房一带护送赵尚志过江，去苏联解决武器、弹药及其它军需物资问题。二、由六军政委李兆麟担任三军、六军联合作战的指挥，组织各部向萝北县公义永村集结，待赵尚志过江之后，袭击萝北沿江日伪军各个据点。

根据会议精神，部署戴洪滨、蔡近葵、李振远、李敬宇、张传福等部队由桦川县新城子，集贤县太平镇等地，先后到达萝北县梧桐河畔公家屯。

一九三八年二月（阴历正月初五），大年刚过，在六军

政委李兆麟与六军军长戴洪滨的主持下召开了三军与六军团以上干部的联席会议，向与会同志传达了北满省委的会议精神。并决定，由六军政委李兆麟带六军二师师长张传福部攻打鸭蛋河（现凤翔镇）；由六军军长戴洪滨率部攻打肇兴镇由三军一师蔡近葵师长率部负责攻打肇兴镇南大营。

戴洪滨军长与蔡近葵师长商定：待部队运动完成，由戴洪滨军长鸣枪为号，两处一起发动进攻，争取天亮以前结束战斗。

李兆麟政委，戴洪滨军长分别作了战斗的动员和部署，叫战士们饱食轻装。一点来钟，由戴洪滨军长与蔡近葵师长率领五百人的马队出发，在漆黑的夜晚，在雪原上行军，只能靠雪光的反射光亮摸索前进。

马队到了肇兴镇西南门外，已经是残星失辉，晨曦初现的破晓时刻，艰难的雪地行军贻误了战机。但戴洪滨军长认为，虽然原定在这个时间结束战斗的计划是不能实现了，但考虑到部队已完成运动，日伪军和警察署尚未察觉，于是果断地鸣枪通知蔡部。两支部队同时发动猛攻。

镇西门派出所所长崔子斌当场被我击毙，伪警长王文全下巴被打掉，鲜血淋淋，两手捂着下巴逃进伪县公署院内。西门派出所很快被占领。戴洪滨军长的部队迅速包围了伪萝北县公署。戴军长命令迫击炮速向伪县公署大院开炮，因炮弹受潮，四十发炮弹放了三十八发，一炮没响。只剩下两发炮弹了。此时，蔡近葵师长部已临近南大营，日军一听镇内枪响，迅速出动，蔡师长一看日军已从正面扑上来，便将部队撤往镇西六军阵地附近与戴部汇合。这时，南大营日军尾追上来，戴洪滨军长命令身边迫击炮连二班向鬼子开炮，这

关键的一炮，果真的响了，日军不知虚实，吓得龟缩回营。只剩仅有一发炮弹了，戴洪滨军长见天已大亮，然后望一下北面，下令："把这一发炮弹向江北苏联放"，于是，炮班校正炮位，用最后的一发炮弹在江北苏联境内爆炸了。其目的是：一、鸣炮通知江北赵尚志军长，六军已执行北满省委会议决定。二、让苏联误认为是日本鬼子打的，引起苏联不满，促使苏军还击日军。果然，不长时间，苏联就陆续向肇兴打炮，牵制住了南大营日军的行动。

太阳冒红了，戴洪滨军长把队伍集中在肇兴镇西面一带作短暂休息。年刚过，又打了胜仗，指战员异常兴奋，都忙着包饺子；炖猪肉，在军长身边的炮班正在煮饺子，突然，哨兵来向戴军长报告，说从富锦方面来了两汽车日军，已进入镇内。戴洪滨军长下令，部队往西撤。这时由中国人开的第一辆日军汽车拉着十几个日本兵追了上来。敌我首尾相距越来越近，我部已快到上街基村东大院炮台附近，戴军长果断大声命令："快占领炮台；快进炮台"！跑在最前面的是六军二十八团郭团长和一名老机枪射手，已距东南炮台十来步远了，日军的第一辆汽车距东南炮台只有二十多米。这个炮台成了双方都要占领的阵地了。在戴军长命令下，老机枪射手以敏捷的动作第一个进入炮台，一些战士也快速相继进入。此刻，日本军官板坂少佐正在车上手握战刀，挥军督战，而东南炮台二层射击口的机枪已经对准日军吐出火舌，复仇的子弹暴雨似地扫射过去，日军指挥官板坂少佐当场丧命，萝北警务局指导官岩崎弃下蜜月新娘仰面归天，其余日本兵横七竖八躺下。车上车下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只有一个日本兵"命大"，腰带挂在车箱后边被溃逃的汽车带回肇

兴街里。

第二辆汽车日军看第一辆汽车只剩一人，其余一命呜呼，立即跳下车来，借江堤有利地形的掩护往上街基村方向运动。此时，戴洪滨军长立即组织队伍全部撤至上街基村，并迅速占领村内炮台和地壕。

上街基村内有三个大院，大院四角都设有炮台。戴洪滨军长指挥部队在东大院东南、东北两个炮台布下火力。东北炮台迎击沿江堤上来的鬼子；东南炮台迎击包米地上来的鬼子；对正东上来的鬼子，两个炮台用交叉火力予以遏制。中间大院为二线，补充东大院一线兵力、子弹与伤员的接应。西大院为指挥所，由戴军长坐镇指挥。

上午十点来钟，守在东南炮台的二十八团吴连长腰部负重伤，被抬下火线。炮台内的迫击炮连二班十九岁的王海珍班长从射击孔看到南北垅包米地里爬过来一些鬼子兵，他们头带着钢盔，象猪拱豆似地往东南炮台逼进，王海珍用步枪对准爬过来的敌人，一枪一个，弹无虚发，“好哇！”战友们拍手叫好。可是，鬼子一个接一个地往上爬。这时他只剩下一颗子弹了。他暗想：这一颗子弹是给自己留着的，不能用了。突然，他的大腿一阵发凉，一个战友告诉他：“海珍，你负伤了”。下午一点多钟，王海珍和吴连长被指挥所用一驾马爬犁向江北苏联境内送去。吴连长在爬犁上已经昏迷不醒，到江北苏联境内就牺牲了。

在指挥所负责看马的通讯员乔占江，看到数名战友负伤，再也忍耐不住，跑到东大院地壕里，准备加入战斗。他见到六七垅地外的一具日军尸体上有一支崭新的大盖枪，他眼馋了，于是他对身边的机枪射手老张说：“你掩护我，我

把那支新枪拿回来”，老张说：“行”。结果乔占江腰部被打中两颗子弹，随即被抬下来。当天下午二点多钟，乔占江与另外二人，坐一驾马爬犁送往江北苏联境内。

枪继续响，战斗仍在进行。

天色已黑，子弹已要打光了，可日军马队、步兵、炮兵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上街基村，情况十分危急。此时，苏联炮兵也不断向上街基村附近开炮。

戴洪滨军长在指挥部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决定突围，然后部队过境入苏。

后记：在这次战役后，日军在上街基村东附近立一石碑，对死于此役的十八个日军称之为“十八勇士”。此碑在“文革”期间已遭破坏，残碣尚存一段，萝北县有关方面准备拍照。

单述臣　卜庆云　整理

日军侵占汤原

慕永贵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二十分，日军炮击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这不是"偶然事件"，而是蓄谋已久和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

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日本军国主义仅用四个月零十八天的时间，即占领了东北四省区，从此东北的大好河山沦陷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空中侦察　投弹轰炸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四日，两架日本飞机，从依兰方向侵入汤原城上空，投下两枚炸弹，空中炸响一枚；另一枚落在今医药公司后道，炸死居民一人。顿时，全城居民惊慌外逃。此时，驻汤原的屠旅（屠全胜队伍），弃城逃跑。城里居民有的驾车、有的背包，扶老携幼，向太平川、向阳屯方向跑去。对此，人们俗称为："跑飞机"。十五、十六、十七日连续三天，每天均有飞机三架飞临汤原上空盘旋侦察。十八日这天飞来五架飞机，有一架低飞盘旋，在城东用机关枪扫射一阵，然后向佳木斯方向飞去。

水路出兵　入侵汤原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八日晨二时，由日军村井少将指挥一

个支队，从依兰码头出发，六时三十分到达东江码头。经过飞机侦察，然后这支侵略军在东江登岸向汤原进军，未遇任何抵抗入侵汤原城。当夜日军还没有站稳，因接师团："速返依兰"的电令，又连夜起兵返回依兰。这是日军第一次入侵汤原。

日官就职　血腥统治

一九三三年六月，日本人参事官津田、副参事官首藤伴同一小队日军，第二次入侵汤原这座无兵戍守的城，并把"膏药旗"插在聚丰号商店楼上（位于今黄金公司，原楼已拆）。从此开始了日伪的统治。汤原的大好河山、森林宝藏、肥沃良田沦于敌手。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汤原获得解放。

土龙山农民暴动后日寇的疯狂报复

苏来　　李亚娟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土龙山暴动的农民在白家沟打死日本关东军饭冢大佐以后，日寇对土龙山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先后血洗十二个村屯，烧毁大小房屋一千余间，死伤牲畜二百九十余头，烧毁粮食七十余万斤，自三月十二日起，日寇用机枪扫，刺刀捅、战刀砍头、劈脑以及火烧、水溺、严刑拷打等多种多样的杀人方法，共杀戮我同胞一千一百多人，其残酷疯狂程度，为世上所少有。现将日寇自土龙山农民武装暴动后，对该地区各村屯逢人便杀，见房就烧的事实以及当时一些亲身经历，亲眼所见者的口述事实经过情况，分别叙述如下：

一、血洗北半截河子

日寇饭冢大佐被打死的第二天，日本鬼子就从佳木斯派出吉川增木骑兵队，到弥荣（现在的孟家岗）开拓团，伙同他们的守备队，于三月十二日清早，从孟家岗经火烧沟朝北半截河子（土龙山区六保六甲）蜂拥而来。先到后居园村，将该村二十几户老百姓和牲畜尽行杀戮后，焚烧全村所有房屋、柴禾垛，垃圾堆也给用火点着了。随后到张二不傻、马青山、崔和、秦奎武以及韩国文、王德花、兰四先生等七个村屯进行血洗。仅这一次，在不足十个小时的时间里，鬼子共杀害这些村屯的男女老少四百四十余人，死伤牲畜一百八

十来头，烧毁大小房屋二百余间和粮食二十余万斤。造成这一地区浓烟蔽空，死尸遍地。即使侥幸活下来的人，到此地步也都无粮吃、无房住、无衣穿，难免于冻死、饿死和病死。

二、日寇收尸队对土龙山五保地区的烧杀

日寇从佳木斯派出到白家沟收殓饭冢等人尸体的河野部队，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五日在徐爽屯附近和梁喜春大院，遭到抗日民众救国军的阻击后，对徐爽屯（现在的四合村东二华里）、四合屯、梁喜春大院等地的无辜同胞，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当时共杀害二十余人，烧毁房屋九十多间、粮食二十余万斤。

三、血洗下九里六屯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九日，日寇在追击土龙山农民暴动后组成的抗日民众救国军途中，血洗了下九里六这个乡间集市。据当时一些亲眼所见和听亲人诉说的老人们控诉所记，日本帝国主义共杀害无辜同胞六百多人，几乎一半以上的人家被杀绝、烧毁大小房屋七百余间、大小牲畜一百余头、粮食二十余万斤。

四、太平镇守备队和警察署，对老张乡屯百姓及爱国志士的杀害

一九三四年腊月的一天，土龙山太平镇日本守备队，追击抗日军“明山队”时，在老张乡屯把张作喜家的二十七间房屋和一十四万斤粮食放火烧毁，还活活烧死张作喜的十九

岁盲女和两匹耕马、又用刺刀捅死前屯三个无辜老百姓。三天后，又来屯子里抓去三名穷苦同胞，用战刀砍死了。

日寇在一九三七、三八、三九这三年，不断对我爱国志士和无辜百姓进行残酷迫害。在这一带被日寇扔进大江淹死的二人，病死监狱的一人，被枪毙的四人，被狼狗咬死的二人。